

中國
貨幣制度
往那裏去

第一章

中國金融貨幣制度的特徵

第一節 中國金融制度的過去與現在

一、中國金融組織的演變

自從高鼻碧眼兒光顧中國之後，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很快地給外國商品打破。於是那些五光十色的舶來品，就像潮水一般，衝進城市，衝進農村；結果，換了大批的金錢出去。於是中國的民脂民膏，就不斷地流到外國去了。我們知道，外國資本家的榨取中國百姓的民脂民膏，並不是直接來到中國各地「就地徵發」，他們倒多數透過中國自辦的機關，來下他們的毒手的。這種機關，便是中國的金融組織。

大家知道，中國在錢莊沒有發達之前，山西的票號差不多握了全國金融的樞紐。不過，票號的組織實在太嫌簡單，

這種「土老」的組織自然不能適應一個新的要求；換句話說，舶來品銷路的擴充，已經使「票號」這一類東西，不能應付金融上更快更廣的流轉；於是錢莊便逐漸起來代替了票號。

錢莊的萌芽雖在明末，可是牠的發榮滋長，却在五口通商以後，換句話說，錢莊的發展是跟着外國資本對華的侵入來的。你看，在清朝將了的時候，所有帝國主義在華根據地——「條約口岸」上的錢莊，不是因為牠們具有十足買辦作用的關係，竟能獨攬全國金融的大權嗎？

可是錢莊這一種金融組織，從近代的經濟組織的觀點看來，畢竟還是非常落後的東西。牠有很濃厚的地方性和行會性，牠沒有近代金融組織所必備的技術和管理；因此帝國主義更進一步的侵入，跟中國經濟自身發展，都會提出一種新的要求，那就是說，中國必須有更近代化的金融組織才好。這樣，新式銀行就以錢莊後繼人的資格，起來僭奪錢莊原有的地盤了。

中國之有新式銀行，始於一八九六年。諸君一到上海外灘看到那所破舊的中國通商銀行，那末，就算看到了中國自辦銀行的老祖宗（假使諸君不善動氣的話，那末我們將告訴你：我們這位老祖宗如跟站在牠西邊的英國金融資本在遠東的前哨——匯豐銀行相比的時候，那簡直比「老鼠見貓」還要

可憐)。接着中國銀行就在一九〇四年成立了；一九〇七年又成立了交通銀行和浙江興業銀行；一九〇八年成立四明銀行和浙江實業銀行。民國以後，新式銀行，就象「雨後春筍」，紛紛添設。牠們的勢力，就這樣駕錢莊而上之了。據北京政府農商部的統計，銀行的資本，在銀錢業資本合計中所佔的成份，竟從一九一二年的百分之三二，增加到一九二〇年的百分之六三。相反方面，錢莊資本却從百分之六八，減到百分之三七。八年之間，銀行跟錢莊的地位竟顛倒了一下。

近幾年來，農村的資金大部集中都市，這種資金除掉有一部份流向外國以外，另一部份便變成都市的游資。此外，再加上公債買賣的旺盛，地產投機的發達，銀行事業在近來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全國銀行數到一九三四年止，總行已有一五九家，連分支行在內，共達一，三四七家。目前各大都市的錢莊，雖然照常執管進出口商跟外商銀行的收解款項；不過大勢已去，他們只有仰銀行的鼻息，來通融資金。因此，目下中國金融的中心，無疑的已移到新式銀行手裏去了。

二、中國金融資本的特性

中國的銀行比起舊式的錢莊來，雖然好像「鶴立雞羣」，可以自鳴得意，可是跟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相比，那就不免

「相形見拙」。比方，根據銀行年鑑所載，全國華商銀行實收資本在一九三三年終，約爲二億六千五百萬元，可是據一九二五年的統計，國內二十四個主要外商銀行的實收資本，却有六億四千七百萬元。再就存款來說，國內一百家左右銀行跟信託公司的存款總數，達二十七億元以上；可是一九二五年二十四個外商銀行的存款額數却有四十九億五千萬元。你瞧，帝國主義在華的金融勢力大不大？

這樣還不算數，帝國主義的金融機關，還攫取中國關鹽稅收的保管權，支配中國的交通事業；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決定外匯的價格，並且還有發行鈔票的特權。這樣，外商銀行實際上做成中國的中央銀行，而華商銀行幾乎做成牠們的附庸。近幾年來，中國人自辦的銀行，雖然「力自振作」，可是外商銀行的優勢，在中國沒有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以前，終是存在的啊。

事實上，帝國主義在華的金融勢力，就不一定單從外商銀行的實力來測量；因爲所謂華商銀行跟錢莊在某些地方，雖然多少與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相衝突；可是一般說來，牠們却往往貼服地受着帝國主義者的束縛，作牠們統治中國金融財政的媒介。到今天爲止，中國的金融資本都不過是買辦資本跟官僚資本的結合。無論舊式的錢莊也好，新式的銀行也

好，牠們直接間接地總在跟帝國主義者效勞。你看，國內工商業的盛衰，固然可以影響到銀錢業，可是這種影響，就遠不及國際貿易所給牠的影響來得大。誰都明白，中國的國際貿易是在外人壟斷之下，或漲或縮。上海的錢莊，每天都要向外商銀行收解幾千百萬元的「洋款」。我們知道。這裏是這樣一套把戲：中國出口的商人先從匯豐或別的外商銀行，收受票據，再經過錢莊，而向外商銀行取款。另一方面，在進口的時候，外商銀行依據「莊票」跟錢業公會的「公單」，而向錢莊取款。這時候，中國銀行所盡的任務就在供給資金給錢莊，以資活動。其次，當外商進出口洋行，需要現金的時候，就委託外商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上，賣出匯票；華商銀行，就買進這種匯票，這一點也是中國金融資本替帝國主義效勞的地方。此外，各家華商銀行在國內各地，代替洋商辦貨，代替洋商收解款項，也都是牠們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們指明中國金融資本的第一種特性，就是牠具有十足的買辦性質；牠跟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資本是完全不能比的。

現在，我們要說到中國金融業跟財政的關係。不錯，從民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在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雖然還沒有什麼金融政策，但是卻有一貫的發行內債的財政政策。中國

內債的發行並不始於民國；可是內債之成爲政策和主要財源，却是民國成立以後的事情。總計北京政府，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六年正式發行的公債二十七種，除去國庫證券、鹽餘借款，內國銀行短期借款和各銀行墊款一萬五千萬元以外，共達六一〇、〇六九、五八八元。國民政府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四年，發行公債，已約有十四萬萬元之鉅！此外地方當局也隨意發行公債，來彌補各地財政的虧空。

我們要問，政府所發行的借大債款，到底誰來承受？不消說得，國內一般民衆的購買力是非常薄弱的；由各級政府往下攤派吧，也並不見有什麼效果，反而增加了人民的不滿。所以最好的路徑，還是經過銀行，託牠們代理發行，或預先抵借。最有趣的，有時債票還沒有印出，就用預約券，先向銀行押款，「以濟眉急」，這樣政府所發行的公債，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就落在金融業家手裏了。

但是，中國的銀行到底爲什麼樂於承受這筆洪水氾濫一樣的公債？這是因爲政府發行公債，常用高的利息和大的折扣，來引誘金融界投資的緣故。公債的利率最低爲八厘，一九三二年後，改爲六厘；債券折扣普通爲六折或七折。計算起來，年利八厘，假使六折發行，實際利息爲四分三，七折爲三分餘，八折爲二分二。這樣，新公債的發行，只要担保

確實，就不愁沒有人來承受了。這就是中國金融資本爲什麼願意競銷公債的道理；同時，也就是中國銀行業爲什麼蓬勃興起的主要原因。

假若諸君回憶一下中國銀行發展的歷史，那末一定可以發現一件有趣的事實，那就是公債發行最濫的年份（北京政府爲一九一七——二二，南京政府爲一九二七——三一），也是銀行蓬勃興起之時。公債發行的擴大，刺激新銀行的添設，相反方面，銀行數量的增加，又使政府發行公債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濫發公債，固然會助長銀行業的畸形發展；而銀行業的擴張，又使政府的財政得到更大的保障。不過這種現象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不相干的。

因此，我們要更進一步指出中國金融資本第三點特性來，即銀行資本脫離生產而發展。

金融資本的脫離生產，一天一天帶着寄生的性質，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在今日帝國主義各國都有這種趨勢，不過在中國，這種情形却具有不同的根源。原來「金融資本」的本意，是指工業資本發展到最高階段而與銀行資本合爲一體說的。在中國，無論從錢莊或銀行的生長過程來說，或從所謂「金融資本」的構成成分來說，都不能跟歐美的金融資本「同日而語」。在中國，金融資本並不是從工業資本發展過來

，而是買辦資本跟官僚資本的結合，牠跟工業和農業等生產事業，本來很少「淵源」(特別是銀行)，因此牠的發展根本就和產業無關。

中國銀行資本投放到工業方面去的，如果跟牠們在公債和地產業的投資相比，那簡直是不足道的。據全國二十七個重要銀行最近十年營業概況的統計，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三一年，放款總額從五一五，三一八千元增加到一、六〇三、九〇五千元，計增三倍以上。其中活期放款多於定期放款，而定期放款當中又多半是公債地產等等的抵押放款和政府的借款。這樣你看，銀行對於工業的放款，再會剩得多少！再看中國銀行放款的統計吧，該行投放工業方面的資金，在一九三〇年佔百分之一〇·一四；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一一·四六，只及到機關放款的四分之一。

我們知道，銀行對於工業的放款，多半是抵押放款，很少做信用放款；而且放款期限很短，利率又高（普通為七八厘，甚至有一分五厘）；因此常常發生沒收抵押品，或竟迫得負債企業，宣告破產的慘劇。在這裏我們應當指明，上面這種情形又因為外商產業證券的喧賓奪主，格外嚴重起來。比方，在白銀風潮未發生以前，外商經營的衆業公所，對於在華外商的產業證券，非常活躍，拍板股票跟公司債票，連

一百幾十種。可是當時衆業公所拍板的證券，平均收益只有年息六七厘；這跟華商證券交易所拍板證券的收益，年息往往在一分二厘以上的情形相比，那真是「相形見絀」。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瞭，帝國主義在華證券市場的喧賓奪主，又怎樣直接間接地，加重了民族產業的負擔。

此外，華商證券交易所是差不多不拍板股票的，牠的交易幾乎全是公債庫券的買賣；這種畸形發展的結果，使證券交易所，變成一個單純的財政證券市場，而決不是一個工商業的長期資金市場。工商業家因為不能發行股票跟公司債票，所以只能借入短期資金，當作長期資金來用；結果，他們除掉負擔苛重的利息以外，還有隨時被迫償還債務的危險。

這裏我們對於中國金融業的脫離產業而發展的特點，大概可以很清楚了把。

三、中國金融業最近的趨勢

上面說過，中國的金融業的「生命線」並不在生產事業的投資，而是公債和地產等等的投機。過去中國金融業的繁榮，就建築在這些投機活動上面。

不過，這繁榮的寶塔畢竟只是建築在沙灘上的。最近地產價格的崩落不是已經引起了一個空前的金融危機嗎？所以，國內較有眼光的金融業家，就來提倡「資金歸農」的運動。

這種運動在客觀的意義上自然是因為農村的破產，和農民的騷動，已經引起全國人民普遍的不安，因此要想用壟塞在上海的資金，去「救濟」一下，「緩和」一下。可是，在目下帝國主義跟封建勢力的兩重剝削之下，「資金歸農」，就等於痴人說夢。農民的「入不敷出」已是普遍的現象，而軍閥官僚搜括之所得，又不能不以上海為窖藏的「淵藪」。這樣，資金又何從而歸農呢？且看一九三三年，由內地流向上海的現金有七千萬之多；而喊得震天價響的上海各銀行農民放款，數目不過一二百萬元。我們且不說，這一二百萬元是真正救濟了水深火熱中的農民呢？還是接濟了高利盤剝的地主；就是真正救濟了農民，那末此區區之數，恐怕誰都不免要有「杯水車薪」之感吧。

在「資金歸農」聲中，美國宣佈了白銀國有政策；於是在中國就發生了「白銀外流」問題。這樣，中國的金融問題，又從「資金歸農」的問題，一變而為「資金出洋」的問題了。上海的白銀，就滾滾外流，帝國主義者跟奸商的私運，使「資金逃亡」的問題，鬧得越來越兇。於是我國當局就在目前中國主權殘缺不全的條件之下，要進行金融的統制。

政府在這方面努力的第一步，就是用白銀徵稅的辦法，禁止白銀出口。牠在這一點上，雖然備受挫折，備受外商的

反對，事實上終算有點成效的。別的不說，牠在事實上確乎使中國離了銀本位，使國內國外的銀價發生一種差額，使帝國主義者要藉提高銀價，以擴充對華貿易的企圖，不免要變成了「鏡花水月」。

政府更進一步的努力是要集中發行，統一幣制。本來，紙幣的發行在一個政治上軌道的國家，都由政府經由中央銀行或者聯合準備銀行的作用，加以控制的。這就叫做發行權的集中。發行權集中的前提在政治上是要有一個完整的（即不受外力的控制）和統一的（即沒有地方割據的局面）政權；在經濟上要有集中的準備和完整的發行權。中國的政府在準備的集中上，似乎是在努力。這裏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的改組和擴充，牠們之變為政府「三位一體」的財庫，確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同時中央銀行所發行的紙幣也在積極擴充，而且已經着手收回各地的地方鈔票（如四川）。

不過，在目前的中國，國境之內有國家治權所不及的租界，在國內經濟界有勢力雄偉，國家法令所不及的外僑。假若我們要施行發行的控制，外商銀行所有的發行權怎樣？那時候，租界的當局必然要主張保持原有以硬幣為本位的幣制，外商銀行便可以藉此重振其發行的業務。住在租界裏的人們（自然連中國人在內）必然不敢使用華商銀行的紙幣，而

要用外商銀行的鈔票，作為價格的標準，正像目前的港紙在廣東一樣。連帶的，華商銀行裏的存款又要漸漸地被提存到外商銀行裏去。這個經驗，武漢的國民政府是領教過的。關於這些，我們且到第三章裏去詳細談吧。

第二節 中國幣制的特性

以上我們對於中國的金融已經說了一個大概，現在我們來看中國貨幣制度的本身。整個中國社會的性質，我們在各地貨幣制度的複雜形態上，也可看出一個大概來。因外商金融勢力的膨脹，在滿洲、兩廣、雲南、天津、上海各地，有各帝國主義者的外鈔發行，這反映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各地軍閥，利用其割據的勢力範圍，各自發行紙鈔，自鑄銀圓、銀角、銅元，這指明了割據的封建勢力，仍舊存在。在下層，各地方豪商、富紳、高利貸者能發行各式各樣的私鈔，這證明了封建制下的商業資本，在中國仍擁有很大的勢力。這三種勢力下的貨幣，各有其作用的範圍和特殊的性質，聯合起來就造中國幣制的蔚然大觀。

一、中國幣制的半殖民地性

半殖民地性的幣制發展得頂高的，是九一八前的滿洲。當時朝鮮銀行一家，就在滿洲發行了三千六百多萬日圓的鈔

票。正金銀行亦發了五百七十七萬餘圓日鈔。此外還有日政府所發行的軍用票，亦在滿洲流通。當時的奉票因濫發結果，每一日圓可兌七十六元之多，於是日鈔就完全取得了上層支付的地位。東北失陷以後，滿洲的貨幣就在統一的體系之下，完全隸屬於日圓。

目下的情形與那時滿洲相仿的，是兩廣。香港匯豐、麥加利有利三行所發的港紙，在兩廣早已取得優越的地位。自銀價高漲以後：兩廣的現洋現銀早給達官要人們販賣一空。於是流通籌碼缺乏。毫洋既不能作上層支付，廣東省銀行的鈔票，信用一向就不很好，更不能濫發，於是港紙就源源而入。在一九二九年時匯豐所發紙鈔僅六千四百餘萬元，到一九三四年年底就增加到一萬萬三千一百餘萬元。外加麥加利有利兩行所發的，共達一五三、六〇一、三四一元。最近說是已達二萬萬元了。這偌大的數目，實在已經超過九一八前日本在滿洲的記錄了。

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的鈔票在雲南流通的數目，我們得不到正確的統計。祇曉得東方匯理的發行總額為九億五千餘萬法郎。姑假定這數目的五分之四流通於安南和其他法屬諸地，五分之一流通於雲南，那就幾及一萬萬法郎了。以工商業並不發達的雲南，而能消納這樣多的外鈔，其勢力也就可想

而知了。

上海青島兩地，目今流通的外鈔還少。至於天津，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底止，外行十一家，共發鈔一千零六十萬元，當華商銀行在津發行總額的五分之一。與兩廣、雲南比起來，總要算落後的了。可是今後的發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各在其勢力範圍內行使其貨幣的侵略。牠們第一步就在逐漸取得了上層支付的地位，這樣也就取得了你的金融命脈。依目前的形勢來講，這一類的貨幣，正在趁着各該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政治的或經濟的勢力的擴大，以及中國金融恐慌的一天天嚴重，加速擴張其貨幣的割據範圍。它不單阻止了中國幣制的統一，而且要在其各自的勢力範圍以內，樹立起自己的統治來。

二、中國幣制的地方割據性

自民國以來，各地封建軍閥，在其各個的割據地域內，創造了各種各樣的幣制，來加強對於百姓的剝削。而且這種把戲，隨着各個軍閥的來來去去，你一次我一次，層出不窮地翻演下來，一直到現在。結果一方面使國內市場永遠不能統一，加強了封建的藩籬；另一方面也就繼續不斷地削弱人民的購買力使國內市場永遠也不得發展。

軍閥們的貨幣剝削有三種。第一種是發行紙幣，使其逐

步跌價，或則乾脆停兌。第二種是鑄造低成色的銀幣。第三種是收買制錢或洋銅來化鑄大大小小的銅輔幣。前一種辦法的行使時期大概較後一些。後兩種辦法大概都在民國十二三年以前很通行，祇是四川的軍閥到現在還應用着。

最先我們來敘述紙幣。(一)東三省在九一八以前，奉票發到十億元以上。吉黑二省官帖各發至百億吊以上。在逐步的跌價中，逐步地剝削着一般的農民和小商人。價格最低的時候，每日金一圓，可兌奉票七十餘元，黑官帖則可兌二千吊。這一方面盡了剝削的能事，一方面也就替日帝國主義開了金融統治東北的門戶。(二)一九三一年，閻馮敗後，山西省鈔停兌。當時晉鈔的發行額達七千萬元(有謂一億元者)，最低的價格跌至每元一角。等到閻錫山回到山西，就以二十與一之比，兌現收回。可是現在山西省銀行，綏西墾業銀號和晉綏地方鐵路銀號等三家，又發行了六百萬元的新鈔。(三)綏遠因在山西的勢力範圍內，前綏遠平市官錢局所發行的綏鈔，價格跌至每三元值大洋一元，至今還未整理完畢。但新鈔又由山西省銀行、綏遠平市官錢局、綏遠豐業銀行等三家發行了五百餘萬元。(四)山東省在張宗昌時代，發行省銀行券二千三百萬元，張氏下野後就全數停兌。目前省鈔發行數不詳。另有山東金庫券和平市官錢局所發行的角券兩種

，信用很壞。(五)河北省在一九二八年時，省銀行所發行的一千六百萬元省鈔，隨着奉張的場臺，完全停兌，成了廢紙。(六)一九三三年，因有孫馬之戰，甯夏省銀行停兌，發行額共百餘萬元。目前發行數不詳。(七)河南在一九二五年時，停兌紙幣在二千萬元以上。(八)陝甘二省，從前有西北銀行所發行的不兌鈔，全部成爲廢紙。目前有陝西省銀行所發省鈔，惟流通範圍僅在陝中一帶。新疆省銀票已濫發至每一千五百兩值實洋一元的地步。(九)湖北紙鈔，已經過吳佩孚時代和武漢政府時代的兩度停兌。目前湖北省銀行又發行省鈔至三百五十萬元。(十)湖南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先後有湖南銀行的銀兩票，流通銀票，和銀元票等，三者停止兌現者共一千四五百萬元。到一九二一年，趙恆惕辦的通商銀行又復倒閉。一九二七年，受武漢政府倒臺影響，湘省人民在漢鈔上亦喫虧不少。現在湖南省銀行所發省鈔又達四百數十萬元以上。(十一)四川從民元起，即印發各種軍用票，鈔票。隨着各個大小軍閥的你爭我奪，停兌、作廢、再發、輪流而行。到最近，各地軍用票到底還殘留多少，無從統計。而渝鈔一項，其數量亦向來秘而不宣。其發行機關有四川地方銀行，重慶銀行，重慶市民銀行，二十一軍，川康銀行，樂山商會等。其中一小部分是操在商業資本家的手裏。(十二)自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止，雲南富滇銀行所發行的不兌滇鈔，數達一億元左右。現由富滇新銀行以二折換發新鈔。僅在銀行上加一「新」字，民衆就被剝削了八千萬元。而且新鈔的市價仍在票面額以下。由此使我們回想到奉票的情形，這也難怪東方匯理銀行的鈔票，要受人歡迎了。(十三)廣東目前的省鈔，有廣東省銀行及廣州市立銀行兩家發行。前者達四千萬，後者達一百五十萬元左右。在不久以前，廣東省銀行的五元、十元鈔，信用極不穩固，至今市價尚低於票面額。至於汕頭，除省行紙外，尚有外鈔多種流通，信用極好。本地發行的「汕毫只票」一項，下面再說。廣西省鈔發行數不詳，市價與廣東省鈔相仿。

這裏我們還得注意晉閻所提倡的「物產證券」。所謂「物產證券」，目的是要廢除金銀貨幣，而依照物品的價值發給證券，來代替「現金代值」的職務的。這一計劃的理想，並要做到廢除「資本私有」，而實行按勞動分配的企圖。這是一個嶄新的烏托邦；現在居然在封建勢力極濃厚的山西提出來，自然值得我們注意的。

要想以物產證券以至紙幣來全部代替金銀貨幣的人們，是忽略了在商品社會裏，等價物必須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這一道理。國家紙幣之所以能代替金銀貨幣的一部分職能，

祇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統一了國內市場，政府信用所得了社會的擔保才能辦到。而且紙幣也祇用於國內，跑出國界就完全失掉其作用。那末，在市場的地方性還非常濃厚的山西，物產證券能取得社會的擔保嗎？在沒有現金準備的狀況之下，物產證券果然會比那種還有一些現金準備的晉鈔更加穩固嗎？結果，金銀窖藏起來了，小縣村鎮將退到物物交換的階段，晉省對外貿易也將限於物物交易，祇有像太原，大同等幾個流通較繁的大城市裏，可強制通行着這新時代的產物「物產證券」。這樣，山西市場的封建性，就會被拉回去幾百年！倘使全中國採用這種制度，那末，全中國就會復返於中世紀！歸根說一句，閻錫山之要發物產證券，無非要借一個新穎的好聽的名詞，多發一種紙幣，來緩和他財政的危機，增加人民的負擔吧了。廢除「資本私有」云何哉！

以上是敘述各地軍閥發行紙鈔的情形，其次我們再述鑄幣。一九一九年，四川軍閥因政府所公布的國幣條例內，規定半元的成色較低。於是成都造幣廠就開鑄半元幣。至一九二六年，各師旅團更爭造一種成色更低的半元幣，強制人民流通，市價跌到四折。一九二八年因該項幣價跌至所含純銀以下，於是各軍閥就收買半元改鑄一元大洋，這就是現在的川洋，市價較國幣低百分之五。剩下來的半元幣，至今還有

百萬枚左右。一九一八年雲南唐繼堯曾鑄造五角銀幣一種，後來已中止流通。其次我們就說到勢力最大的廣東雙毫。現在全國所流行的銀輔幣，已幾乎「只此一家，並無分出」。其所含的純銀成色為千分之四七四·八，較滿清最高的銀幣成色幾低一半。自民國元年起至民十停止鑄造為止，共發十億零五千五百萬枚。這就造成了兩廣的毫洋單位，其地方的割據性表現得最為尖銳。

再次我們就說到銅輔幣。銅輔幣有銅元和制錢兩種。民國以來，各省各地的大小軍閥，都因鼓鑄銅元，好處很大，就拚命地搜羅制錢和購買洋銅化鑄。因此制錢就在市面絕跡了。銅元的種類有二百文、百文、五十文、廿文、十文數種。而四川又有大一百、小一百、大二百、小二百之分。各省各地所流行的都不一律。譬如湖南沿粵漢路一帶通用當二十銅元。湘西一帶又以當五十當一百流行得最多。湖北流行當二十銅元，長江下游一帶則為當十銅元。陝西南部與川北相連，流行二百文大銅元，一百文就把當二百磅為一半。到了河南，沿隴海路東下，當二百與當二十銅元也很通行。此外在山東、廣東、廣西、雲南等省，有銀質輔幣。山東雲南二省，有一角及五分兩種；兩廣祇有五分的一種。上述種種銅銀輔幣，牠們實質價值照面額相差都很大，所以市價看各地

的供需數量而定。四川當二百銅元已跌至每元可兌廿千。漢口當廿銅元每元兌六千五。陝西南部，愈向南則銅元價愈高，愈北則愈跌。



上面我們說過了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兩種勢力下，所造成的貨幣剝削和貨幣割據之後，我們還要說一說在商業資本勢力下的貨幣形態。商業資本在中國大小城市裏，仍擁有很大的勢力。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中國的商業資本就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鞏固其本身的勢力。在那許多中小城市，以及交通比較不發達的大城市裏，商業資本更利用市場的地域性，幾乎壟斷了各地的貨幣金融。我們知道：以前各地充當上層支付的銀兩，就是商業資本支配下的一種貨幣，這種銀兩依各地的名稱，成色，分量來區別，全國共有五六十種之多。上海的規元，當作金融上的支付單位者，達六七十年之久。上海舊式的商業資本，曾經拉着帝國主義的金融勢力做後台，與新興的金融勢力作過一番鬥爭，這是大家知道的事實。在商業資本支配下的另一種貨幣，是劃洋。這種劃洋此刻在名義上雖然已跟銀兩一起廢除，可是在杭州、紹興、寧波等地，我們仍能看到它們改頭換面地存在。除上述兩種以外，我們就要說到各地的私鈔。這到現在仍無

有效的辦法廢除它。各地方的商業資本家、富豪、地主、紳士、高利貸者，憑藉一己的信用和勢力，各各以商家、私人、或商會的名義，發生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錢票和私帖。僅在汕頭一處，有所謂「汕毫只票」，發行行莊就有四十六家之多。而此種只票的發行莊，都以財產作保證，所以風潮時作。不久以前，汕頭幾乎成了白票世界，一般民衆，受苦不小。目前流通於重慶的本票，也是一種私帖。徐州的花票，由本地各錢業、票號、商會發行，一向沒有保證準備，風潮已鬧過不止一次了。陝南漢中，石泉等十一縣內，共有私鈔八十八種，自一元而至幾十吊幾百吊的各種不等，牠們都只能在本城，本市流通。其他各地的例子我們舉不勝舉，在交通阻塞，封建的經濟性質愈濃的地方，這種私鈔幾乎排斥了一切省鈔，和銀行鈔。現在財政部已經頒佈了整理私鈔的條例，這在大城市裏一定會遭到一般商業資本家的阻力是無疑的。而在那些市場閉塞的中小城市裏，現洋既早已絕跡，而公私兌換券又不能建立起信用來，此類私鈔是更沒有辦法來廢除呀。

綜上所述，帝國主義者的貨幣在沿海跟邊境各省，各依其勢力範圍割據起來。兩廣是英帝國主義者的範圍，雲南是法帝國主義者的範圍，華北則尚在日英的角逐之下。其它如

山東、上海、福建等處，在最近的將來，隨着中國的金融恐慌的深刻，外幣會逐漸擴張其勢力範圍；那是極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中國這三大範疇的幣制中，帝國主義的這一範疇是向前發展的。它一面妨害中國新興金融勢力在自己薄弱的信用基礎上，建立起統一的幣制來；一面他利用着中國封建性的幣制的複雜和信用的薄弱，不斷的擴張其勢力；而最後的目的就在獲得中國整個的貨幣權。帝國主義者這種努力，在中國的貨幣已經根本發生問題的現在，格外來得兇狠。

第二章

中國目下的貨幣問題

第一節 目下貨幣問題的特徵

在前一章書裏面，我們已經從整個中國國民經濟的立場出發，說明了中國金融制度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以及這些特性所產生出來的全國貨幣制度的紊亂。現在我們還要從同樣的觀點出發，來談談目下正在發展的貨幣問題。不用說，這一問題的形成，和前章所說的種種特性，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因為貨幣問題是比較複雜的問題，爲了使大家容易明白起見，我們還得先把貨幣問題的一般內容概括地提一提。

在現在這種資本主義社會裏面，貨幣好似一支測量長度的尺，各種商品相互交換的時候，非靠牠來媒介和測量不可

；假使沒有了牠，我們就說不出這種商品值多少，那種商品又值多少。一支尺能夠測量長度，是因為牠本身代表一定單位的長度。和這一樣，貨幣能夠測量商品的價值，也是因為牠自己也包含一定單位的價值。譬如我們案頭上有一本書，這本書值價一塊錢，這就是說，一塊銀洋所包含的七錢二分銀子，其價值和那一本書的完全相等。不過貨幣這支尺，到了某些時候，就會和測量長度的尺不同，牠一時會放長，一時又會縮短，而且變動得還很利害。還拿我們案頭那本書說罷，雖然牠本身的價值不會增減絲毫，可是假使貨幣本身起了變化，那末，牠可能值到一元以上，或者不到一元。掉轉來說，也是一樣，譬如我們手中有一塊銀洋，在早上能買到我們案頭上的那本書，可是到了下午，因為貨幣本身（不是那本書）起了變化，會買不到那一本書，或者買得更多一點。試問在這時候，靠交換為基礎的商品經濟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將感受到怎樣一種影響呢？無疑地，牠所感到的是動盪，混亂，乃至不能存在。所謂貨幣問題，歸根結底說一句，實在就是這一點。

貨幣本來好似一支尺，是代表一定單位的價值的，那末牠為什麼會發生上述那樣的伸縮呢？原因可以有兩種：一種由貨幣數量的膨脹而來，一種是由貨幣數量的收縮而來。我

們用實例來說明罷。

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德國軍費的支出太大，在大戰以後又需要償還巨大的戰債，但是財政稅收因為各種原因却相反地減少。那末，怎樣應付呢？在這時候，牠只有拚命濫發不兌現的紙幣，增加政府的收入。這樣，通貨就無限制地膨脹起來，馬克就拚命跌價。因而一個馬克(指紙馬克而言)的購買力究竟有多少，便無從規定。再如目下的英美，發行紙幣的金準備是充實的，但是他們停止兌現，將鎊元的購買力人為地降低；換句話說，一個美元的紙幣和一個美金已無一定的關係。再因為通貨膨脹的結果，鎊元的購買力也非常不定，使工商業家無法正常地進行其生產和營業。以上是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貨幣問題。

其次來看一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牠們是「命該」替代他們的宗主國銷納過剩商品的；因此，牠們的對外貿易，往往是入超。牠們爲了平衡入超，就非輸出大批現金不可。另外，殖民地往往要向宗主國貢納大宗的款項（像印度對英國），所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存金和存銀，必然要日趨收縮。這是一種現象。另外，當恐慌到來的時候，不論資本主義的宗主國也罷，或是半殖民地國家也罷，流通於市面的貨幣，必然要退藏起來。有存貨的廠家，無法脫售存貨，

有資金的銀行，不願冒險放款，資金隨着恐慌而冰凍起來。在這時候，一國的資金雖未減少，但是因爲資金的周轉已經阻塞的緣故，市面上也會感到同樣的通貨收縮之苦。假如我們說這種現象是相對的收縮，那末，前一種現象就可說是絕對的收縮了。這兩種通貨收縮的現象，無疑地會加速物價的跌落。在那時候，國家現金的缺乏，以及財政的困難，往往使原來的貨幣本位簡直無法維持，而轉向到通貨膨脹的路上去。目下的中國就在備嘗這樣的苦楚。

扼要地說一說：貨幣這支尺一時變長，一時變短，沒有一定的價格本位，換言之，一時反映爲物價跌，一時反映爲物價漲，使社會經濟動亂不堪，這就是表現貨幣已經不能維持牠的安定，而成爲問題了。可是，我們知道貨幣本身是不會自己發生問題的，貨幣之所以成爲問題，是因爲社會的生產已經發生了變卦，或竟爆發了危機的緣故。

以上所說是貨幣問題的一般內容，接着我們來說中國的貨幣問題。諸位假使住在中國內地，或是住在窮鄉僻壤，那末你們一定會發現：那些農民對於金錢，真看得「一錢如命」。這固然是因爲他們的收入實在太少，不夠養活家小的緣故；可是另一方面，內地的缺少貨幣却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假使你在一個很大的村莊上，要去湊滿十塊銀洋，那恐怕就是

天大的難事罷。事實上，莫說你要十塊雪白的現洋，就是，你要十塊錢的鈔票，也並不十分容易。當然，那些經過軍閥土棍濫發過紙幣的地方，又要當作例外的。

諸君在這裏也許會這樣想了：近年以來，內地的現金大部份已經集中到幾個大都市裏，鄉區貨幣的枯竭，是在意想中的；至於城市裏面，有的却是錢呀！這種想頭是有部份的根據的。上面已經說過，農村資金的集中都市，是促成中國金融業「孤單繁榮」的原因之一；都市裏面的確現在還有游資的存在，這是一點。此外，比方我們住在上海，一天到晚所看見的，無非是錢的來往，大到像銀行，小到像弄堂口兌錢的鋪子，銀元銅錢，進進出出，誰也想不到貨幣有枯竭的一天。這樣似乎很難說像上海那樣的地方，現在也犯了通貨收縮病罷。

是的，以上海來代表中國全國，本來是開內地老百姓的玩笑；內地的錢都流到上海來了，上海還會感到像內地同樣程度的通貨不足嗎？不過，上海第一，不是沒有漏洞的聚寶盆，內地現金儘管流到上海，可是積在上海的現金又會運到外國去的。第二，內地運到上海的現金並不能統統流通在市面上；剛剛相反，這些現金往往以庫存跟別的方式，凍結儲藏起來，這樣市面上流通的貨幣也就感到不夠。有這兩個原

因，誰又能一口咬定，上海就絕對沒有通貨不足的毛病呢？實際上，這種通貨不足的現象，從上海信用的收縮上已經表現得萬分明顯。因為銀行錢莊對外放款的收縮，在工商業方面實在已有「不能週轉」之苦；換句話說，一般企業正因為缺乏流動的資金跟流通的貨幣，正像魚兒出水一樣，活活地等着乾死。因此，我們不妨這樣說，中國各大都市除掉幾個濫發紙幣的地方（像汕頭）以外，至少是患着相對的通貨收縮病的。不用說，我們在這裏還要注意到一點：目前中國各地的通貨早已發生人為膨脹的現象，因此通貨收縮的程度，一部份已給沖淡的了。

通貨收縮了，結果又是怎樣呢？第一，一般工商業因資金不能周轉，更加速地破產；第二，一般物價更因通貨收縮而狂跌，結果使國內生產大眾就更陷於失業和生活苦難的境地。第三，通貨過份收縮的結果，還根本影響到中國貨幣的本位，這樣又會招致列強對華貨幣權的爭奪，強使中國放棄自己獨立的貨幣本位，投到某一個列強的貨幣集團裏去，更進一步地推進中國的殖民地化。現在我們再分節來加以詳細的說明罷。

第二節 貿易入超與軍費膨脹

從前節所論，中國目下的貨幣問題是由存銀外流，通貨收縮開始的。而中國現銀外流基本的，經常的原因，就是貿易入超和軍費膨脹。我們就從這點說起罷。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關稅權是操在列強手裏的，當列強猛烈地向中國傾銷過剩商品的時候，中國絲毫也不能採取保護稅則的防衛手段。此外再加以國內經濟的普遍衰落，甚至米麥這類農產品，還不得不仰賴外來的供給。這樣，巨額入超就成爲中國歷年對外貿易最大的特色。一九三一年以後，入超數值漸趨減少了；可是入超的額數畢竟還是很大，（就一九三四年而論，入超額還有四萬九千餘萬元）。牠在中國國際收支上依然是莫大的負擔。

不過在過去，中國國際收支史中却有一段「奇蹟」，那就是貿易儘管入超，在中國的國際收支上，白銀也會是入超的。比方，下面的表，就告訴我們這段值得希罕的「故事」：

年 別	貿易入超額(百萬元)	白銀入超額(百萬元)
1927	146.9	101.1
1928	318.7	165.7
1929	389.6	164.8
1930	464.4	104.3
1931	816.4	70.8

爲什麼以往貿易和白銀竟會同時入超呢？難道外國貨肯

白白送給中國嗎？不是的。這種同時入超的現象，我們中國人是備受犧牲之後，才能換到的。因為：第一，列強傾銷到中國來的商品，有一部份是作為資本輸出的；那就是說，牠們把商品變賣為貨幣以後，就在中國國內興辦工廠或借給政府，來就地搜括。第二，中國在海外各地——尤其是南洋一帶，有成千成萬為歐美資本家所稱頌的「任勞任怨」的僑民，他們每年總有大批的金錢匯回祖國，贍養他們的家小。這兩種無形的收入就是平衡中國國際收支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就是使白銀得有入超的原因。

這種白銀入超，從一九二八年起，特別增多，這是因為當時海外銀價，開始狂跌，外國白銀大批對華傾銷的緣故。倫敦的銀價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整整跌落了一半，但是中國是用銀最多的國家，國內銀價較海外為高，因此大批的白銀，就源源從海外流到中國，賺得大宗利益。

然而當世界經濟總恐慌一天天加深，中國的東北四省整個淪落以後，前述各種使白銀入超的條件有的起了變化，有的甚至消滅。第一，華僑匯款隨着華僑經濟的衰落，一年減少一年。據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估計，一九三二年華僑匯款有三萬二千萬元，一九三三年漸減為二萬萬元，一九三四年也不過二萬五千萬元。

第二，近年以來外國對華的投資也減少了。這是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的加深，使得各國資本家不敢向外多多投資；因此近年來各帝國主義列強對外投資的活動，差不多已經停止。其次，「九一八」的砲聲一面已經攪亂了遠東安定的局面，同時又造成了日本的獨占，因此其他列強更難對華投資。據中國銀行方面的估計，外人在華投資額數的擴充，一九三三年僅三千萬元，一九三四年亦不過八千萬元，比較一九三〇年竟減少了百分之六十。

前面我們說過，華僑匯款跟列強在華的投資，對於中國白銀的入超，都起很大的作用。現在兩者都大大的減少了，因此白銀也就跟着從入超而變為出超。你瞧，中國在一九三一年還有七千多萬元白銀的入超，一到一九三二年，就出超一千多萬元，一九三三年出超一千四百多萬元，去年再加上美國白銀政策，白銀的出超竟達二萬五千六百多萬元，因此，過去「樂觀」的奇跡，也不得不像夢樣地過去了。

前面提到，使中國存銀外流，通貨收縮的基本原因，除掉貿易入超和無形收入減少而外，還有軍費膨脹一點也是很重要的。據財部本身的官場報告：南京政府成立以來的支絀數有如下表（單位百萬元）：

年 度	支 絀 數	佔支出數之%
1928	80	19.4
1929	101	18.7
1930	217	30.3
1931	130	19.0
1932	86	13.3
1933	147	19.2

每年所以會有這樣巨額的財政赤字(實際還不止此)，原因就在每年軍事債務費的開支太大。而且一年大過一年。這用什麼方法來彌補呢？第一，就是靠公開發行債券和債款的收入(一九三一年度爲一萬三千萬，一九三三年度增至一萬八千萬)，第二靠無形的羅掘(例如禁烟的烟稅等等稅收)。而這些債款和特稅，當然也和關稅鹽稅統稅一樣，統統要加在國民大眾的肩上，而且一年重似一年。民間的血汗是這樣滾滾地流到國家的財庫裏去，然後再從那兒暢流到海外去。有一部份是以償付外債本息和公開購買飛機大砲的形式，流到外國的財閥和軍火商人手裏，這是直接表現在國際收支的圖表上的。還有一部份則以私下購買的方式飛到海外去，這是一般人們所不能正確估計甚至無從估計的部份。

其次，我們再要說到國內軍人在中外銀行的存款，以及牠和財政赤字與中國存銀外流的關係。從前曾有人說張作霖是中國最大的資本家，這話在名詞上當然有點混淆，不過牠

倒明白地指出中國的軍人在橫行三年五載以後，是最能搜得大批的錢財的人。中國財政上連年的巨大赤字，以及還未表現在財部報告裏面的龐大支出，一部份就因為軍人大事『蓄積的關係』。譬如四川，那兒的田賦最多的已經預征到民國八十年以後，財政和人民的生計一樣，竭蹶得無以復加，但是將軍司令却大腹便便；而且他們更進一步準備做瑞士或紐約的哈同去了。去年四月，紗業大王榮宗敬從廣東回滬，他說那兒的『富有者都遷居香港作寓公』，軍老軍少自然是其中的多數。這些離國求安的準備，無疑地是要引起國內存金的大批逃亡的。據匯豐銀行總行歷年的報告，其存款業務有如下表：

年 別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總 計
1927	386 (百萬港元)	170 (百萬港元)	556
1929	434	219	653
1931	558	215	773
1933	666	207	873

總計六年之間，匯豐銀行所收存款增加了三萬二千萬港元，其速度實足驚人。牠的來源無疑地只有那些羅掘有方的中國軍人和官僚。我們還記得一九二九年匯豐銀行曾經宣佈某某夫人在一二年間存入七千餘萬元。一九三四年報載廣州某總司令的太太，因市上發現匯豐銀行的偽鈔，就倉猝地將留在身邊的鈔票親自攜去兌現，一次就有幾十萬元。照最近

趨勢看來，那些達官要人的資產，現在不大願意存放在上海，而要直接存到香港去了。所以上海匯豐銀行的存款是可能減少的，但是中國的軍人官僚對該行的存款却在突飛猛進呀。

匯豐銀行還不過是個例，實際上中國的軍人和官僚，將人民的膏血存放在紐約倫敦的還多着呢！

固然，私購軍火和軍人官僚將大批金錢存到國外銀行去這兩點，並不是新的現象，不過近年來因內戰的特別頻繁，政治的極度不安，牠們的發展確比以往猛烈，因而對於目下的通貨收縮的危機，牠們確乎盡了很大的力量。

第三節 美國白銀政策的威力

使中國存銀很快地大量地流到外國去，使中國貨幣本位陷入非常嚴重的危機的動力，當然是厲行一年有餘的美國白銀政策。截至現在為止，我們可以按着牠的推程序，以及牠在中國所發生的影響，分成三個階段去觀察：第一個階段是美國政府於一九三三年底批令造幣廠替代人民鑄造銀幣起，至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羅斯福總統簽署白銀國有令為止，是白銀政策逐漸推行的時期。第二個階段自白銀國有令簽署以後，至一九三五年初宋子文氏敦請上海外商銀行家訂結所

謂『紳士協定』止，是白銀政策猛烈推行，牠的威力十足顯現的時期。自那時以後到目下為止，是白銀政策依然邁進，而其威力因國內國外的各種關係，好似暫趨和緩的時期，這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第三個階段。現在再來做較詳細的說明吧。

美國政府批令造幣廠替代人民鑄造銀幣，其用意就在增加白銀的用途，提高白銀的價格，同時也就是後來積極厲行白銀政策的開始。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海方面的銀行家已經深切領悟到這一點了，他們竟勇敢地聯名籲請羅斯福總統，盼望他「採逐步提高方式，勿取突然漲高步驟，以減少中國銀市之紊亂」，但是事實上，並未得到何種結果。羅斯福當然不會因為這一紙具文，忘掉了白銀資本家和大財閥所囑咐他的任務；不過直至八月為止，他所採的步驟總算還不十分突然。譬如七月份紐約的平均銀價每盎司○·四六三美元，雖較一九三三年各月為高，但是仍在一九三四年的平均銀價○·四七九美元之下。在這兒我們當然不能否認那時的白銀政策，已使中國金融大受震撼，不過那時中國所受的影響，不像八月以後那樣嚴重吧了。當時中國的存銀已經因為海外銀價較高，開始向外流出，而七月底上海中外銀行存銀總額反較前年十二月底增加一千五百餘萬元，這祇是因為農村資金集中城市的過程，更甚於白銀外流的過程而已。這是第

一個階段的情形。

可是到了第二個階段，情勢就不同了。因為美國政府積極收買白銀，海外銀價也就漲得更快。商人們將中國存銀作為純粹商品運到紐約倫敦去，所能獲得的利潤，非常可觀，因而白銀外流也就分外迅速，分外有勁。

紐約倫敦銀價(每盎司價)與上海中外銀行存銀消長表

年 月	紐約銀價	倫敦銀價	上海中外銀行存銀指數
1934. 7	.4631 美元	20.51 便士	331.94
8	.4894	21.37	334.31
9	.4948	21.88	306.27
10	.5237	23.58	278.85
11	.5423	24.25	246.10
12	.5439	24.40	227.34

從七月起，到十二月止，倫敦和紐約的銀價節節高漲，上海中外銀行的存銀也就跟着潮水一樣地流出。當時通貨收縮的影響，可以從拆息上漲，債市下落，地產衰落，以及一般銀錢業工商業拮据得無法動彈的窘狀之中，表現出來。

在十月中旬，財部爲了「遏止」此種惡潮，突然頒令加征白銀出口稅和平衡稅，以阻止白銀向外狂流。但從前表看來，十月以後，白銀外流之勢，不但未曾減退，反而繼續加盛，這是什麼原因呢？第一，因為當時海外銀價還是節節上漲，銀販報關出口，繳納出口稅和平衡稅，稍待數日還是有和

可圖。第二，外商銀行家對於平衡稅的不滿，同時財部生怕關稅收入減少，迫得它不能將平衡稅對策如實地履行起來，今將十月至十二月這三個月中，平衡稅不曾十足徵收的差額百分數，列表如下，以供參證：

月 別	應徵而未徵之平衡稅率%	
	最 高	最 低
十 月	18.00	1.94
十 一 月	11.65	4.76
十 二 月	9.89	3.59

所謂平衡稅既然不會發揮其平衡的作用，那末在海外銀價日趨高漲的條件之下，白銀繼續猛烈外流，自然是應有的現象了。

在平衡稅法令公佈以後，還有一種現象與中國通貨收縮有莫大的關係，那就是白銀的偷運。白銀偷運之風在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就有，不過到了十月下旬以後，才大盛起來。十月以後，白銀的外流有兩條主要的路線，一條是經廈門廣州而到香港，一條是經過漢口天津而往大連。這兩條路的偷運，動輒數千數萬，統計起來，一定大可驚人。這些偷運的人們所以能夠這樣自由自在地幹去，主要是因為外國的砲艦能在我們的沿海內河直航。中國的存銀，就在海外銀價高漲不已和公私夾運的條件之下，急湍似地流出去了。牠直接促進

金融恐慌，間接加深一般產業的危機。

現在我們再說到第三個階段。美國對於白銀政策的推行，今年八九月來並未稍衰，四月十日和二十五日兩次提高銀價的果敢行動，還是不久以前的事。最近紐約銀價雖然稍有上落，但一般總在七角左右，較去年又高了許多。不過從上海中外銀行的存銀而言，最近八九月來却無多大的減少。因而有些人說：「嚴重時期似已過去」。這裏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中國存銀自去年一年繼續不斷地大批外流以後，已經到了相當枯竭的境地，外商銀行的庫存更有此感，所謂「紳士協定」云云，實際上就因為外商銀行存銀無幾，給中國當局一個人情吧了。第二，上海存銀的統計，本來只是一種「不求甚解」的東西，紙面上的報告是否真正可靠，照目下情形看來，更有值得懷疑的地方。同時華北平津一帶，白銀還大批地私運出口，不過因為無從統計，也就不覺得可怕而已。

第五節 工商衰落與通貨的相對收縮

貿易入超，軍費龐大以及美國實行白銀政策，這三種動力，使中國存銀不斷地外流，這對於中國金融的威脅實在夠嚴重了，然而問題之嚴重還決不止此。我們在第一節裏曾經

提及：農村資金集中在各大城市，而這些現銀又完全凍結在大銀行的庫房裏面。這種凍結的現金對於一般工商業絕少周轉的作用，實際上等於流出。因而問題也就格外嚴重起來。關於這一點，谷春帆先生曾有很具體的說明。他根據中國重要銀行營業概況研究一書，觀察二十六家華商銀行的庫存額和放款額的消長，並列成下列一表：

年 別	庫存額(千元)	庫存額比數	放款額比數	庫存一元應攤放款數總計(元)
1929	139,522	100	100	8.75
1930	156,480	112	116	9.10
1931	194,281	139	131	8.25
1932	253,352	182	136	6.55
1933	305,136	216	166	6.65

從這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極有趣味的現象。歷年來的庫存額和放款額數都是增加的，不過後者沒有前者那樣增加得快（前者五年間增加百分之一一六，後者僅百分之六十六），因而庫存一元所起的放款作用，就一年低落一年，五年間從八次的機會降為六次的機會。這就是表示銀行庫房中的存銀，漸漸離開工商界的活動，變為靜止的死物。

同時他又用銀錢業的票據交換來代表金融周轉的速率（因票據主要乃由工商界的買賣引起來的），指出銀錢業的放款本身，在市面上的流通速度也在逐年減少，請看下表：

年 別	票據交換額比數	放款額比數
1929	100	100
1930	128	116
1931	160	131
1932	105	136
1933	82	166

從這表我們可以看出前後不同的兩種傾向：即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少數的放款因周轉靈活能夠做到多數的交易；一九三一年以後可不同了，較多的放款却只能做較少的交易。無疑地，這是因為牠的周轉速度凝滯的緣故。

此外，通貨凍結的現象，我們還可從近年來銀行方面的存放業務來觀察。今舉中國銀行為例：

1931——1934中國銀行存款比較表(單位千元)

年 別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同業存款
1931	243,560	174,242	44,853
1932	183,601	234,632	58,314
1933	189,769	211,200	183,314
1934	182,856	251,884	111,953

第一，活期存款一般地在不斷減少。這是表示工商業的衰落，以及他們手頭遊資的枯竭，因為活期存款的主體多半就是商店廠家。第二，同業存款去年突減七千餘萬，這表示同業間借貸關係減少，同時也就是反映一般工商業間的交換

衰落。第三，定期存款的繼續增加，是表示富有的人們因工商業破產，投資太不安全，因而祇想用定期存款的方式獲得較多的利息。這是資金凍結的另外一個證據。

其次我們再來觀察近年來該行放款性質的變化：

1931—1934年中國銀行放款業務比較表(單位千元)

年 別	活期放款	定期放款	貼現及買進期票
1931	110,696	188,235	35,006
1932	99,417	189,437	34,063
1933	125,844	189,183	36,405
1934	184,187	197,761	30,003

銀行放款和存戶存款處於相對的地位，因而他們對於定期活期的態度也完全不同。譬如就放款來說罷，銀行方面是願意活期而不願長期(即定期)，因為目下工商業這樣蕭條，經營長期放款是非常危險的。所以近五年來，活期放款大見增加，而定期放款則所增無幾，對活期放款的猛增而言，實是相對地減少了。一九三四年貼現和買進期票的減少，又是表明工商業的往還十分蕭條。從這些不同性質的放款業務上看來，信用收縮，通貨呆滯的暗影，我們大概是很明白了罷。

就是因為信用收縮，通貨呆滯的緣故，目下上海中外銀行庫存雖然還較一九三一年的多過將近一倍，市面上却仍然

感到通貨極度收縮的痛苦。此種相對意義的通貨收縮原是工商業衰落的結果，不過到了現在，牠又反轉來加速工商業的破產，和促進中國貨幣本位的危機了。

總上所述，中國通貨的收縮，是在絕對和相對的兩重意義之下，成長和加深起來。目下牠正隨着經濟恐慌之後，使國內的物價越加狂跌，財政越加支絀，工商業越加沒落，而且更進一步造成中國當前十分嚴重的貨幣本位問題。而帝國主義列強正在利用中國當前的難關，爭取中國的貨幣權。那末，中國的貨幣權究竟會落到誰的手裏去呢？

第三章

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裏去

第一節 白熱的國際貨幣戰爭

記得一九三三年倫敦舉行世界經濟會議，白頭議長麥唐納說到世界貨幣戰爭無法緩和的時候，就不禁感慨係之，說「世界是不得不飲乾這失望的苦杯的了」！

可不是嗎？在現存的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條件之下，就是少數金融寡頭，也不得不飲盡這「失望的苦杯」；至於一般大眾，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的「飢餓之衆」，那是更不得不在資本家們「明槍交戰」，「暗地鬥法」裏面，做着他們「舉杯痛飲」的犧牲品了！

現今世界經濟恐慌——嚴格地說，是特種經濟蕭條的特徵之一，就是資本主義各國金融制度的瓦解，貨幣制度的紊

亂，和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貨幣戰爭，一天一天尖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各國幣制多以黃金為基礎，金鑄幣的流通，是異常自由的。銀行所發鈔票，隨時可以到銀行裏去兌換金子；所以在那時的鈔票，終不會跌價。

在大戰期內，各國幣制就大起紊亂。帝國主義國家為要籌措戰費，不惜濫發紙幣，同時停止兌現。這樣，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幣價，就大跌特跌。

不過，誰都知道，安定貨幣，對於資本主義是一個最有利的條件。所以，戰爭一告結束，各國政府便先後安定幣價。在資本主義局部安定期內（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可以說完全安定下來。

可是一九二九年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又連根動搖了戰後世界金融體系的基礎。牠首先對於弱小國家的貨幣給以致命的打擊。一般債務國家，牠們平時固然可以用增加出口和舉借外債的方法，來償還牠們的債務；可是一到恐慌時期，債權國的資本幾乎停止輸出，貿易的額數又急激減少，因此只有把自己的存金和一部份外國貨幣，來抵償外債。這麼一來，黃金的存額就大大地減少；結果，那些債務國家，就沒有力量繼續維持金本位了。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阿根廷和烏拉圭首先停止紙幣的兌現；只因為牠們都是比較小的國家

，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並不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般人都大不注意。

可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那號稱「金融帝國」的英國也竟放棄金本位了，這才使世界金融市場受着重大的震驚。到同年十月底，英帝國統屬下的自治領和殖民地，除了南非聯邦之外，都放棄金本位，其它瑞典，挪威，丹麥，葡萄牙，埃及，玻利維亞和芬蘭，也相率脫離金本位。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們的東鄰日本，於佔領東北「大腹便便」之後，也宣布禁金出口，十八日並停止紙幣兌現。一九三二年四月，希臘放棄金本位，五月暹羅和祕魯也脫離金本位。最後，資本最稱雄厚的美國，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也宣告停止金本位了。到一九三五年初，金集團的「積極分子」比利士也竟放棄金本位，減低幣值百分之二十五，荷蘭也有在一九三五年年底貶低幣值的意思。

到現在為止，世界上號稱維持金本位的，雖然還有法、荷、瑞士、意大利、德意志、捷克、波蘭、盧森堡等國，但其中德意捷克波蘭諸國，在嚴厲的貿易統制，匯兌統制，和通貨管理之下，事實上金本位已經僅存軀殼；尤其是德國，牠的金準備只占發行額百分之二，所謂金本位也者，正和希特勒別種政策一樣，只是騙騙人罷了。

現在我們不談那些弱小國家，因為黃金滾滾流出，不得已而放棄金本位的情形。我們要問，世界上兩大金融霸王英美兩國，為什麼肯違背資本家們基本的要求（安定貨幣），而「甘冒不韙」？

不錯的，英美之放棄金本位自然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就英國說吧，首先是經濟恐慌的加深，使金融界感受強烈的威脅。一九三一年夏季中歐的信用恐慌，德奧的銀行擠兌風潮，迫令中歐各國銀行紛紛向倫敦提回短期存款。同時，法國也從英國方面提回大批存款，以期在政治上威脅英國。此外，英國海軍又發生譁變，英帝國主義發生全部動搖，因此資本逃亡的現象非常嚴重。在此情形之下，英倫銀行的存金，大部份流出。英國政府迫不得已，就停止兌現，脫離金本位，於是英鎊價格像瀑布一樣，往下直瀉。

美國呢，一九三三年空前的銀行風潮，一般民衆紛紛將黃金窖藏起來，同時又生怕資本大量流出國外，於是美國政府趕快停止兌現，禁金出口。

然而，這樣我們已能說明英美放棄金本位的「初衷」了嗎？不然的，決不然的。英美資本家看出，停止金本位一舉，不單是「防患未然」的手段，而且還是挽救經濟恐慌，加緊對人競爭的有力武器呢。大家知道，目前資本家們，左手壟斷

了商品，右手壟斷了貨幣。用右手的貨幣直接去購買左手的商品呢，他們非但沒有偌大的消費力，而且也不會那樣的愚蠢，（因為這樣，那裏可以撈得利潤呢）。拿右手的貨幣分散給大眾，以增加購買力吧，或者拿左手的商品分散給大眾去消費吧，那又都是現社會制度下不能想像的事，因為這樣便根本沒有了資本主義社會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家唯一的出路，只有用膨脹通貨的手段，去增加右手貨幣的數量，企圖用幣值的跌落，來反映物價的高漲。他們只有運用降低幣值，使匯價低落，用傾銷的方法，去展開他們的海外市場。而放棄金本位便是貶低幣值的前提。這樣，國際間熱辣辣的貨幣戰爭，就開始了。

現在我們明白了，放棄金本位，和貨幣跌價，在一方面固然是經濟恐慌加深的結果，是各國統治者不得已的措置；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同時就利用這種幣價跌落，來奪取市場，加強自己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障地。

很顯然的，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用貶低幣價的辦法，加緊對於工人的剝削（因為工資決不能跟貨幣跌價同比例地提高），因此牠們在出口貿易中，可以得到一筆額外利潤。牠們就能以這種得到額外利潤的可能為基礎，在世界市場上廉價傾銷，排擠其他國家的商品。

在事實上，英國從放棄金本位後，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兩年中間，牠在世界貿易中所佔的比率，確乎大大增加；牠竟從美國手裏奪回牠世界貿易的第一把交椅。但到後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底放棄金本位，就使大英帝國不大容易招架。日本幣價的跌落，比英鎊更加「乾脆」，在一年以內，英鎊跌落了百分之三十，而日圓竟跌落了百分之五十。日貨不僅很快地排擠了別國市場上的英貨，甚且單刀直入，切入英帝國的心臟，英國自治領和殖民地（特別是印度）也感到日貨爲患了。

直到一九三三年春，英國最大的敵手美國也放棄了金本位，美元價格，一跌再跌，於是英國感覺到自己的武裝已被解除。牠眼快手快，就來跟美國講交情；牠再三跟美國談判安定貨幣。一九三三年夏，就在倫敦召集世界經濟會議，會議主要的問題就在如何穩定貨幣。誰知美國竟嚴厲拒絕安定貨幣，那也無怪當時首相麥唐納要悲哀地叫着「世界不得不飲盡這失望的苦杯」了。英國這種轉挽的企圖，直到英倫銀行總裁諾曼赴美以後，才遭到最後的慘敗。

回頭再看美國。美國的資本家並不比英國笨些，他們深知老猶英國並不真個掛起免戰牌來作什麼「城下之盟」，他們毫不相信英國那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善相」，真有什

麼好心。自然，他們既然握起武器，終要給英國一個「照面」，殺得牠一個「紅白不分」。他們拼命利用美元的跌價，加強自己在世界市場上的陣地，奪回英國於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兩年內所奪去的市場。一面在國內力行通貨膨脹，以謀克服恐慌，恢復繁榮；結果，美國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確乎來上一個「投機的繁榮」，但從秋季起，又跑進「結實的」不景氣和恐慌的死路去了。總看起來，英鎊和美元的廝殺，在一九三三年美元確占了上風。

到一九三四年情形，就不同了。英國資本家當然不是力主不抵抗的小斯可比，他們在資本主義危機之中，雖然已經沒有什麼旋乾轉坤的法寶，可是在應付美國貨幣攻勢這一點上，還不是一無辦法的。我們記得，當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的當初，資本家們對於幣價問題，確有很大的出入。在產業資本家和輸出業家，固然力主貶低幣價，而在銀行資本家方面，他們因為債權孔多（英國是最大債權國之一），生怕幣價跌落，影響債權，所以堅持安定幣價。不過到一九三四年，他們礙於國際及國內情勢，見到非更進一步運用減低幣價的利器不可，所以兩方面的意見，就漸趨一致。一九三四年十月，英財政大臣張伯倫曾經宣稱，英國必須採取獨自的通貨政策，英鎊集團以內的國家應當建立更加密切的關

係，同時應當竭力避免鎊價的急性的安定。這些話，就可以看作英國資本家的意見已趨一致的表現。

英鎊的價格繼續跌落了。自然，鎊價的跌落並不全是英統治者有意的勾當。事實恰恰相反，英國國際收支的出超（季節地向美國和別國購買原料），美國短期資金的流回本國，這些才是使鎊價繼續跌落的主要原因。至於一九三四年英國所用的匯兌平準基金政策却很少作用；而據一部份人的估計，英國三億七千五百萬鎊的匯兌平準基金，已經虧蝕淨盡了。可是，英國資本家之很願看見這種鎊價自然的跌落，畢竟已是事實。

在另一方面，金鎊集團各國的關係的確變得格外密切了，牠們的影響也一天一天擴大；到現在鎊價的決定，不僅為英國本國的國際收支所左右，並且要受金鎊集團各國的國際收支的影響呢。這些英鎊國家的繼續貶價，使全世界醞釀着通貨膨脹的氣運；甚至還促成金集團內捷克貨幣的貶值。

美國怎樣呢？自然，牠是一不做，二不休的。誰不知道，貨幣戰爭是帝國主義列強經濟戰爭的最後一幕，跟着起來的便是「真刀真槍」的軍事戰爭？誰不知道，那在帝國主義的武裝廝殺期內，誰保有最多的黃金和別的貴金屬，誰便能保證最後的勝利？不錯，美國是手屈一指的保有黃金最多的國

家（約四十億金元）；不過，牠還嫌不夠，牠還用平準基金來購進黃金。

現在我們要注意到美國的購買白銀政策。根據我們上面的指明，白銀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是很大的，這一點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充分看出。在那時因為交戰各國競造銀幣（特別是英國），銀價飛漲，一時頓感着白銀的飢餓。美國政府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公佈白銀國有令，限期將國內白銀，以每盎斯〇·五〇一元的價格收歸國有。根據該項法案：美國購銀數量要達國庫準備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那就是說，牠除掉向國內購銀以外，還要向世界市場購入一、一五二、七〇〇、〇〇〇盎斯以上。

當然，美國購銀程序的目的，並不限於準備大戰。羅斯福總統之順從白銀派的要求，還有別種因素。羅斯福總統是熱中於減低幣值，以提高物價，挽救恐慌的。而美國的通貨膨脹派却又竭力為白銀派撐腰，他們主張貶低幣價，增發銀行券和紙幣，收買白銀，發行銀證券，以提高物價。所以當購銀法案公佈之後，接着便要發行三億二千萬元的銀證券，以購進白銀。這種辦法無疑地是通貨膨脹的一種手段，結果，交易所裏美元的價格果然跟着低落了。因此，我們可以說，白銀政策是美國近年來應付貨幣戰爭的一貫政策的一環吧。

了。

美國政府這種戰術的另一目的，我們應當指明，它是有意於將中國拉入美元集團中去的。關於這，將在下節細說。同時，美國提高銀價的結果，使一般應用銀幣的金本位國家感受重大的威脅。銀價提得太高，銀幣就有被人鎔燬，而整個幣制加入美元集團的可能。因此，英國對於銀價提高，印度盧比發生不穩的消息，是不能不特別注意的。

以上，我們對於英鎊和美元的鬥爭，說得已經很多。我們知道，世界上的貨幣集團除了英鎊集團和美元集團之外，還有一個金集團，或稱法郎集團。屬於金集團的國家到一九三四年止，還有法、比、荷蘭、瑞士、意、德、捷克、波蘭，盧森堡諸國。不過意德波捷諸國已經名存實亡。

如上所述，世界大多數國家已經放棄金本位了，這些金集團國家爲什麼依然留戀着金本位呢？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歐陸諸國，戰後曾經飽嘗通貨膨脹的痛苦，不願再度嘗試；同時金集團首領法國是所謂「高利貸帝國主義」，牠有偌大的債權，所以也不願貶低幣值，減少債權，同時法國進口稅的提高，其他國家的貿易統制，也儘足阻止黃金外流，所以也無用放棄金本位。

然而別國匯兌傾銷的武器，終究不大容易對付的。法國

在恐慌的初期，雖然表現爲繁榮的孤島，可是近年以來，牠的經濟情形，已變成資本主義國家最壞的一個。金集團其他國家都是如此。一九三四年金集團各國的工業生產都比一九三二年還低；在那些國家非但談不到景氣的恢復，恐慌的程度還在一天天加深。金集團國家在此情形之下，也在做最後的掙扎。牠們之間的關係，也一天天密接；同時採用種種協作辦法，防止金本位的「隕越」。牠們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北京集會，決議將一九三三年在倫敦所訂的協定加以擴充。根據此項協定，法、比、荷蘭、波蘭、意大利、盧森堡諸金集團國家必須相互援助，保持金幣的現有平價。同時再由比利時首倡，此項協定還擴充到貿易方面，規定締約各國須用必要方法，增加相互間的貿易額百分之十。同年法比兩國再貸款荷蘭，法國也援助意國，維持荷意的幣價。

這是事實的一面。一九三四年金集團各國經濟空前的惡化，使一部份資本家的心理，傾向到通貨膨脹方面。在金集團的首領法國，膨脹派在逐漸抬頭，比荷各國也因此接連引起內閣風潮。

國內的情勢固然如此，國外的環境更覺險惡。當我們談到金集團的前途的時候，我們決不要忘掉英鎊和美元的鬥爭。英國和美國對於金集團的態度是極端相反的。美國對於金

集團的戰術，是竭力想維持金本位國家的現有平價；牠怕的是金集團各國脫離金本位，因為這樣，牠們會馬上加入英鎊集團。英國對於法國和其他金集團國家則力勸其貶低幣值，這樣，英鎊集團可以擴大了，到那時再來和美國談國際通貨的安定。

我們知道美國在一九三四年底對於金集團通貨的安定是用過很大的力量的。牠在法郎價格達到現金輸送點，即有流出危險的時候，就用牠的平準基金，購進法郎匯票。牠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借給比國國立銀行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資金。無怪當時英國的報紙要說，美國要握金集團的領導權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英鎊跌價對於金集團的威脅，畢竟太嚴重了。自從英國放棄金本位後，以法郎表示的英鎊匯價，是在不斷地低落——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的一二四·〇五一，直跌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的七〇·九六。上面說過，金集團各國在近年來的經濟基礎異常脆弱，再加上英鎊的繼續壓迫，金本位的維持確乎萬分困難。一九三五年春季，金融基礎比較薄弱的比利時，便被迫而放棄金本位了。結果，比幣減低幣值百分之二十五，同時維持對英鎊的比價，事實上即等於加入英鎊集團。荷蘭的前途，也是很危險的。

這裏，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英鎊和美元的鬥爭，已經

伸展到金集團的範圍之內。我們知道，金集團各國，牠們在經濟組織上，在金融體系上，都比中國強固得多，前進得多；難道在這樣落後的中國沃野上面，竟聽不見鎊元的鞞鼓聲嗎？

第二節 列強對華貨幣權的爭霸

實際上，列強之間的貨幣戰爭，早已波及了中國。就列強對華貿易來說吧。各國厲行通貨膨脹，對於國內的勞工，固然加強其剝削；而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很顯明的，在貨幣跌價傾銷之下，不單中國的民族工業受到重大的打擊，中國的農民也在外國廉價農產物的傾銷之下，很快地破產。就是這種意義之下，列強正在利用貨幣跌價的手段，拚命在中國爭奪牠們的市場。單就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兩年英美日三國對華進口額來說，英國僅保持其原有的地位（自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一六·七〇，降為一九三四年之一六·一六），日本則因繼續貶低幣值，再加上別種政治軍事的條件，牠在進口總值中所佔的比重，乃從百分之一一·三九升到百分之一三·八七；至於美國就因為牠厲行白銀政策，繼續抑低幣價的關係，從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二二·一七，增加到百分之二六·六四。

不過，帝國主義列強在爭奪中國市場的時候，只靠牠們自身幣價的上落來加強牠們的陣地，力量還是不夠的。比方說吧，英國固然貶低了幣價來對華傾銷了，而美元的跌價，可以比英鎊跌得更兇，同時牠還能利用牠雄厚的資金，使中國的銀價提高，使得銀元的購買力較高；這樣英國就無可奈何了。可是美國單是這樣做法，也是不見大效的，因為日本還有生活程度更低的勞工，可供資本家的犧牲，牠可能使日圓的價格降得更低；這樣美國又能奈何牠呢？

所以，帝國主義者爲要全般地控制中國的市場，同時全面地控制中國財政金融起見，牠們不得不更進一步在中國的貨幣制度上，想個澈底的辦法。這就展開了列強對華貨幣權的爭霸戰。

原來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貨幣，要使牠成爲自己的附庸，是殖民地經營中不可少的步驟。只有在殖民地貨幣同化於宗主國之後；然後主屬國間的貿易，以及政治，經濟上的投資，可以圓滿地發展。這種事例，遠者如英國之於印度，近者如日本之於東北四省，都是那麼一套。

在另一方面，假使一個半殖民地或者後進的獨立國家，一旦牠的貨幣作爲某種貨幣的附庸或者說加入了某個貨幣集團，那影響就非常大的——特別是在這管理通貨盛行的時代

。比方，倘使中國的貨幣加入美元集團了，中國的國幣每單位規定等於美元的幾分之幾；那末中美間的匯兌就變成十分穩定；即使有些漲落，通常也不會超過現送點。於是，中國的進出口商人，就會感覺到向美國買賣商品所負的危險比較的輕；因為他們現在只有物價漲落的危險，而沒有匯價漲落的危險。在目前，誰都知道，匯價漲落的程度，還要比物價漲落得利害。如此，美國對華貿易自然可以格外發達了。

其次，在投資方面，匯價的不穩定，往往是一個極大的障礙。在目下假使中國人借美金，一旦金貴銀賤，便要吃虧——中國過去所受外債匯兌上的損失是誰都不會忘記的。政治借款可能這樣的「飲鴆止渴」，商業借款却誰都不敢這樣嘗試。反之，假使美國人把自己的美金兌成中國國幣借給中國人，他就要負這匯兌上的危險。債權人負了這樣大的危險借錢給別人，除了政治上有什麼特種原因之外，是不可能的。但是，倘使中國加入美元集團了，那麼這重難關，便自然而然地打破，美國的金元資本，就可以大量地輸入中國。造成牠在中國的優勢了。

爲什麼我們說，加入某個貨幣集團在目下管理通貨盛行的時候，所受的影響尤其大呢？比方說罷，假使在各國沒有放棄金本位之前，中國就改用金本位了，那末這種改變可以

使所有金本位國家都得着貿易和投資的便宜。即使中國國幣可以和某一國貨幣的比例，合成一個整數（即如中國國幣二元等於美元一元之類），那末這樣所給予那一個國家的便宜，也只有計算的便利，影響是並不十分大的。所以，在那種情形之下，美國必須再使中國把所有的海外準備金存放在牠的國際金融市場紐約，然後，牠對於中國才有較大的支配力。

反之，像目下的情形，事態的發展，就大大兩樣了。公開放棄金本位的國家，如英美日三國等；非公開放棄金本位的國家，如意德等，貨幣價值的漲落，完全操在政府手裏。比方，美金的純金含量，已經一度的減低百分之四〇·九四，後來又要減到百分之三〇。美元的價值，只要經國會的通過，大總統下一道命令執行，就可以大跌特跌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假若中國加入美元集團，美國的金融寡頭就可以通過貨幣，而操縱中國的經濟政治，同樣的，假若加入英鎊集團，英國的統治者就可以通過貨幣而支配中國的命運。

上述情形是資本主義總恐慌當中，在第二次大戰的前夜，由於各國金融機構的崩壞，所發展出來的新的形態。我們知道了這點，才能了解列強，特別是英美帝國主義在各國貨幣權的爭奪上為什麼要這樣拚個你死我活。同時也唯有知道了這點，我們才能了解列強，特別是英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

貨幣權的奪取，爲什麼鬧得這樣「短兵相接」。

我們在上節講過，世界上現在有三大貨幣集團，就是英鎊集團，美元集團和金集團。這三個集團之中，在世界的規模上，暗鬥明爭得最利害的是英鎊集團和美元集團。至於金集團國家，牠們自身已像「日薄崦嵫」，幾乎無以爲繼，所以也並沒有力量向外開拓陣地，牠們能夠保持自己集團裏面的鬥士，不要臨陣脫逃，已算萬幸的了。事實上，正如我們上節所說，金集團之在今日，再不是採取攻勢的集團；相反的，牠們自身已是英鎊和美元爭取的對象了。

所以，在遠東方面參加貨幣戰的，主要的也只有英鎊跟美元。不消說得，用機關鎗和大炮爲後盾的日圓，在這裏是必須有份的。關於這，我們在下面還要說到。

事實上以中國貨幣權的掠取爲目標的遠東貨幣戰爭，早就已經開始。在一九三〇年凱末爾顧問團，遠涉重洋替中國計劃改行金本位。那時在他們所擬的金本位幣制條例草案裏，訂定中國預期採用的金本位幣「孫」，就等於美元四角。美國在那時的確企圖，在使中國改用金本位之後，大大地發展牠的貿易和投資，以完成「金元帝國」在太平洋方面的統治。不幸得很，在上述的幣制草案發表以後，接着就是一個金貴銀賤風潮，使這個計劃遭受頓挫；再接着就是「九一八」事變

，日美間的矛盾使這個計劃只好「束之高閣」。我們也可以說，當時美國勢力在遠東的猛進，尤其是牠在東三省投資的企圖，是促成日本武力攻襲中國的一個因素。

「文明國家」在「開發」殖民地的時候，自然要運用牠們最便宜的威力。所以在美國企圖用資本勢力征服中國的時候，日本只好用牠的大炮和飛機。然而，在日本運用武裝勢力之後，美國也必然要進一步地運用牠的資本勢力。所謂白銀政策，就是美帝國主義運用牠的資本勢力，威脅中國的一種手段罷了。

一般人對於美國白銀政策的估量往往只是偏面的。有人說，羅斯福的白銀政策是在取悅於代表銀礦主利益的銀派議員，這是對的，然而是不夠的；美國的收買白銀政策，如果只是爲了銀礦主的利益，決沒有使牠世界化的必要，牠只須高價收買國內新產的礦銀，至多也只須白銀國有就夠了。現在牠要收買世界的白銀，無疑的是有向外攻略的意義的。

那末，是不是要提高什麼遠東和南美人民的購買力呢？不是的，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飾辭，至多也只代表美國一部份資本家的幻想。在中國，是事實俱在，無用贅言的。美國白銀政策之在中國，只引起了空前的金融恐慌；牠不單沒有提高中國人民的購買力，牠是更進一步地把中國人民僅有的

購買力都摧毀了。所以假使白銀政策的目的真個在提高遠東人民的購買力，那末美國早就應該改變牠的白銀政策。可是美國竟不管中國的再三籲請，還是「我行我素」，這就可以表示所謂提高購買力也者，無非是欺人之談罷了。

所以，白銀政策的終極目標，除掉上節指明的為準備未來大戰和在國內加緊通貨膨脹之外，最重要的，乃在取得中國的貨幣權，甚至要控制南美和遠東方面，採用虛金本位制各國的貨幣權。羅斯福總統為要替美國在遠東和南美開拓廣大的投資場所，替美國的產業資本在南美和遠東開拓廣大的商品和原料市場，並且為了取得世界最大富源中國的貨幣權，來決定英鎊和美元之爭的最後勝敗，然後提出這樣一個為美國整個資本家層謀利益的白銀政策。

那末，白銀政策到底怎樣能夠奪取中國的貨幣權呢？換句話說，牠怎樣才能使中國的銀洋，連結到美元上去呢？我們現在假定，美國在白銀收買到相當程度的時候，可能將白銀價格穩定下去。假使白銀對於美元能以一定的比率穩定牠的價格，那末，中國的銀本位幣就可以完全跟着美金的變動而變動，中國也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美元集團。這樣，美國對華的貿易和投資，以及由此而起的政治的控制，一定可以急速地發展和加強起來。至於那些採用虛金本位的國家（國

內用銀，國際用金），也要因為銀質的金本位幣含值日增，而有被熔化的危險，或者也只有加入跟白銀已經發生固定比價關係的美元集團。

美國期望的標準銀價，恐怕是每盎司值美元一元二角九分，適合金銀比價一與十六之比。一九三五年一月底的銀價還只有五角四五分，距離一元二角九分還差七角五分之鉅。這表示美國離開穩定銀價的日子還很遠呢。

一九三五年四月美國工商業界特派商務考察團來華考察。這個考察團雖非官派，可是所負的使命並不算小。牠要調查中國的金融，關稅，貿易，而特別關心於中國的幣制，誰又能說，這次的考察不是為美國決定其對華貨幣戰術而預作準備呢。最可注意的，是考察團剛到中國，美國政府就將銀價從六角四分五猛提到七角一分。以後事態的發展，雖然並不十分顯著，可是美國政府在向這個方向邁進，那是無疑的了。

上面我們關於美國的戰術已經說了好多，現在我們要講一講英國的手法。英國這次應付美國的貨幣戰爭，是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英國金融資本在遠東的前哨——匯豐銀行和它的夥伴麥加利銀行，大英銀行等等，在美國宣佈白銀國有之後，當中國的金融界感受嚴重威脅的時候，當中國人

民千呼萬喚，要制止白銀流出的時候，牠們却悄悄地把大批白銀從上海裝運出口；而且大部份是運到香港屯積起來。當時人們還奇怪爲什麼白銀不流向紐約，而運到香港，誰知道這正是英帝國主義的錦囊妙計。牠們這樣運銀出口，在營業意義上固然可說是提防中國政府干涉白銀出口，甚至改革幣制（如銀元貶值，或發行不兌現紙幣），同時也可以賺取一批運銀出口的利益。

然而，營業上的估量畢竟尙是其次，最重要的意義，還是英鎊對於美元所取「以退爲進」的攻勢政策。英國眼見美國白銀政策，來勢頗兇，牠便「計上心來」，故意收回自己在華的資本，極力挖盡中國的白銀，先把中國的金融和工商業市場澈底地破壞一下；這樣給美國一個警告，即使美國能夠取得中國的貨幣權，它在中國也無從發展牠的貿易和投資；因爲那時中國的市場已經像敗軍搜括過後的敗落鄉村一樣，僅剩些破瓦殘礫了。

自然，英國方面單是把匯豐的存銀運往香港，還不足以澈底地破壞中國的金融業和工商業。此外，牠還必須採取別種有力的手段。這便是牠一反從來對華投資的態度，暫時地不但不再投資於中國的工商業，反而要收回資本了。匯豐銀行舉行拍賣申新七廠的事件，便是英人這種收回資本過程中

的衆所週知的一幕。一九三四年年關，上海銀錢業工商企業，紛紛倒閉，這裏匯豐銀行的盡力收回資本，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英國「趁火打劫」的任務完成了，一向以「孤立的繁榮」自豪的中國金融業，竟招致了空前的危機，工商企業更像「秋風落葉」一般紛紛倒閉。在這裏，英國還可以使中國民衆更加抱怨於美國，認定這是白銀政策的結果，而造成一種反美空氣，這便可以使美國奪取貨幣權的企圖，受到重大的打擊。你看，在一九三四年底中國不是已經有許多學者主張要反抗美國的白銀政策嗎？而中國白銀出口增稅之舉，不是一般的認為是反抗美國的一種行動嗎？

是的，中國當局見白銀流出影響財政金融太大，就突然在十月十五日明令徵收銀出口稅，並加徵平衡稅。平衡稅的訂定，用倫敦的白銀市價為標準。這是有一部份英人已經趾高氣揚地說，中國已經加入英鎊集團了。這種說法，自然不免過於樂觀，英國的金融資本也決不因此自滿，牠當然要採取更進一步的手段的。牠對於中國當局征收白銀出口稅，自始就表示反對，因為這樣在某種程度以內，會減弱牠對中國市場，也即是對美國的威脅作用。同時牠更警告中國：中國不能用自己的紙本位去抵抗美國的白銀政策；中國也不能有

控制匯兌，奪取外商銀行——特別是英商銀行——營業勢力的舉動；中國必須放棄憑藉平衡稅，以自定匯兌行市的企圖；最後，中國必須加入英鎊集團，以反抗美國。

這種面面俱到的以退爲進的戰術，威嚇的力量確乎是很大的。美國曾經表示牠對於提高銀價，將取更和緩的步驟，這就是牠不得不將奪取貨幣權的過程延長。中國呢，在當時情形之下，要減低幣值或採用不兌現紙幣本位都是很難辦到。因此牠最穩妥的辦法，還是向英國求援。據日本報紙的記載，中國政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就向英國當局磋商借款，到後來便有英國願借二千萬鎊給中國，維持財政和金融的消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泰晤士報 (Shanghai Times) 也用特大號字標題，揭載南京政府擬向列強銀團（英美都在內）借款的消息。一九三五年春季國際對華借款的聲浪，喊得震天價響，而且中國當局也承認有此一舉了。這其間，英國無疑地是佔領導的地位。

在這裏我們要提到英國沙遜爵士的建議。沙遜爵士是上海沙遜洋行的大班，他在上海的地產投機是不容忽視的，他是上海的大地主，所以他對於英國資本勢力的突然退出是持反對的態度的；因爲那樣要造成中國通貨收縮的恐慌，而使他的地產跌價，甚至地租無着。他之不願吃虧，就使他向美

國提議改向印度政府購銀。事實上要請美國向印度政府購銀，只是沙遜爵士的幻想，或者是一種對付中國人的詭計；因為只有向市面購銀，美國才能達到提高銀價的目的。這樣，美國政府對於他的建議自然並不理睬；可是另一方面却引起了一種相當可能的猜想，那就是說，印度的存銀雖然沒有賣給美國，却可以利用機緣，裝到中國來做補充的用途。英國對華的借款，假如一旦成功，那末據我們的猜想，帳簿上的英鎊借款，事實上是要用印度的存銀來支付的；這種存銀，經過印度或者中國造幣廠，鑄成一種銀質的中國金本位貨幣，就可以流通市面。再規定這種金本位幣，可以依一定的比率，以英鎊為最後的兌現。這樣，中國就已經加入英鎊集團了。

這種猜想，並非全無理由；反之，牠的可能已經由沙遜自己的嘴來證明了。沙遜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又發表了他舉世注意的「救濟上海金融計劃書」。他在這裏除了竭力指斥美國的白銀政策所加於中國經濟的威脅，同時贊成維持白銀本位，在表面上「討好」中國以外，就乾脆地慫恿中國對英作英鎊借款，發行上海鎊券，造成中國的銀幣英鎊並行本位的幣制，而實際上便把中國拉入英鎊的集團。你看他苦口婆心地勸說：「英鎊刻在世界中，為大多數所採用。……隸於

所謂英鎊集團之各國，皆較他國更為繁榮，此世人所公認」。誰不知道，兩三年以來，英國金融資本利用貶低幣值的手段，加強對於國內和自治領殖民地人民的剝削，經濟狀況確比金本位的國家稍微好些？又誰不知道，假若中國也加入英鎊集團，那末，所繁榮的決不是中國的民衆，而還是倫敦和僑居上海像沙遜一類的大資本家？瞧罷，沙遜爵士在謊話連篇中（他說「如中國準備擔負鎊券印刷之經費，而照余所擬計劃辦理之，則實際上，並無借款之必要」。這不是荒唐極頂的欺人之談是什麼？不先借款設立匯兌資金，果能發行鎊券嗎？）也有不少天真的自白的。比方他說，「余知私人在此可覓取英鎊信用。若欲覓取他種貨幣之大宗信用，則余知其不易。試舉一證以明之，余雖不能以自由公債，或黃金，或白銀，抵借上海銀元。但余於數日前能以租界中區之地基，借入英鎊，但余不能在上海現有狀況中，用去此項金鎊，若在余所擬之計劃中，則余當能使用之矣」。這裏，我們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沙遜的救濟上海金融計劃，並不真要救濟上海的金融，不過要救濟自己的金融罷了。自然，我們倘若以為這個計劃，完全出自沙遜個人的動機，那又未免太小看牠了。沙遜是道道地地的愛護祖國的人物，他的鎊券計劃，不但有利於自己，而且還有利於英國一般的資本家。他說，「吾

人苟考慮在滬所購之貨物，與所享之服務，其來自國外者佔大部份。……試以旅館言，其所有一部份費用歸於國外，其所置地毯刀叉等物，須隨時更換，其所備之酒類，須來自外洋。……而旅館所有之收入，出自來滬旅行家之囊中者亦復不少。旅客苟能免除當地匯兌之困難，因其所願……」。你看，他替他「祖國」的貿易多麼體貼入微啊。

沙遜爵士不但在說話上是這樣認真，他在行動上也夠勇敢的。他在一九三五年初，曾借給中國一筆金鎊借款，合國幣四百萬元。他這筆借款，一面可以補救匯豐銀行運出資金過急的缺憾，而一面在賣出金鎊之際，也可以使英鎊對中國國幣跌價。這在貨幣戰爭中也可以說是預擺一着棋子。

常識告訴我們，在太平洋角逐的主角，是英日美三國；而日本更儼然以東亞主人自居。中國有事，日本須先顧問，英美有話，應先通知日本，這種情形，遠之從田中奏摺，近之從天羽聲明，都表現得明明白白。那末，日本對於英美在中國的貨幣戰爭，竟能「熟視無睹」嗎？

決不是的！事實上，英美在華貨幣戰爭最近所以更加白熱，一大半原因還是因為中國一半已被吞在日本肚裏的緣故。英美帝國主義這時因為不可能用軍艦和大炮，把已給人家吞下的部份，重新把牠拉來，牠們只好爭用資本的勢力，把

殘餘的部份抓在自己手裏。

然而日本連這一點也不能容忍的。不過，牠將怎樣辦呢？英國要把中國拉入英鎊集團，美國要把中國拉入美元集團。日本呢，牠把中國拉入「日圓集團」吧！不，這有些不好意思，因為所謂「日圓集團」，在今日委實太不像樣；要把中國拉進「日圓集團」，比把中國拉入中日軍事同盟，還要困難百倍；因為在國際的意義上，日本的鎗桿子確乎比「日圓」要強硬得多。不錯，日圓在近幾年來國際貨幣戰爭中，常是佔到優勢。譬如英鎊匯價能貶低四成，而日圓匯價則能貶低七成；結果英國的市場竟被日貨攪擾得七顛八倒。可是，日圓的匯價儘管可以盡量降低，日圓的力量畢竟還不夠跟英鎊美元來幾個「照面」的。牠的金融組織比起英美來，還不免相形見絀，特別是近年來財政赤字的增加，使得日圓的力量更加薄弱。所以，日本要拉中國加入「日圓集團」，還是夠不上的。

那末，還是借款給中國，徐圖控制吧？是的，日本在過去幾個月裏，也屢扮姿勢，裝作要借款給中國的樣子。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旬，華盛頓，倫敦和上海三處，同時傳出日本對華借款二萬萬元的消息。當時中國當局似乎一度着迷。而中日經濟提攜，甚且中日經濟同盟的消息，就傳遍世界。

英美方面頓時緊張起來，兩國要人就慎重磋商。美國國務院方面認為「中日經濟提攜為兩國新政治經濟同盟；日本對中國予以金融財政上之援助，獨占在華勢力，以便實行其亞洲政策，其對國際政局之影響甚大」(華盛頓，三月一日哈瓦斯社電)。那時以英國為主動的國際對華借款便重新熱鬧起來。且看路透社三月二十二日倫敦電訊稱：「聞中國當局去夏（按當時美國還沒有實施購銀法）曾探詢英國借款之可能性，當時英當局視此建議殊難實行。現有理由可信與中國友好之某團體鑒於中國白銀大缺，及遠東一般之政局，近復向英國探詢借款事。此間金融界之意見，中國關稅收入，雖見下落，供借款之担保品，仍不難覓得。惟謂以此種債券售於市場之手續，殊不易決定。衆信英國主張由舊日之銀行團經手，以免日本從而阻梗」。那時倫敦方面對於遠東局勢，加以密切的注意。丕爾爵士在上院力稱英國須要用武力保障英人在長江一帶的勢力。

實際上，日本要借款給中國，只是日本當局的一種姿勢。日本政府在財政方面還是自顧不暇，至於民間財閥，也多非常乖巧，他們都不如西原（經手那筆一踢糊塗的「西原借款」的）那樣的勇敢了。所以日本對華借款是不可能的。牠之口口聲聲說什麼「願予中國財政經濟上之援助」者一面是要

「討好」中國，一面是當作拒絕英美對華借款的盾牌吧了。

要中國加入「日圓集團」，在沒有使中國成爲牠完全的殖民地之前，是不可能的，同時，借款於中國也只是一句空話。那末，日本怎樣辦呢？唔，牠方法多得很呢！中日經濟提攜不是牠的有力武器嗎？牠要用經濟提攜的口號，使中國淪爲其經濟上的附庸，使中國成爲牠一個農業的殖民地。在貨幣方面呢，牠也用「以退爲進」的策略，主張自己改用銀本位，而結成中日滿間的銀集團，——在這集團裏，日本是一個當然的領袖。英美的資本，固然強盛，而日本的鎗炮至少在遠東是可以獨霸的，因此英鎊和美元在華的火併，將來結果如何，日本還是個決定的因素呢。

第三節 「淪爲附庸」呢？「獨立存在」呢？

一九三五年六月就在華北事件鬧得滾熱的時候，英國政府決定，派財政經濟首席顧問李滋羅斯爵士（Sir Frederiek Leith-Ross）到中國來調查財政金融狀況，定於八月啓程。其後電訊紛傳，各國都將派員來華，會同調查。

大概在三月底罷，英美看到中國一定要舉借外債，渡過難局。同時據哈瓦斯社電訊，「當時各關係國承認澄清中國貨幣局勢，爲借款之先決條件。因此又復提議在南京召開貨

幣會議」。貨幣會議的發起召集，自然由英國主動。你看，當時「倫敦金融界人士，關於未來南京貨幣會議，以為議程中將列入一重要問題，即中國貨幣究應與黃金，日圓，美元抑英鎊發生聯繫是也。據此間金融界意見，中國貨幣與日圓發生聯繫，因政治及技術上之理由，斷難辦到。至於美元，則因美國貨幣政策，尚在試驗階段，亦不穩定。故中國貨幣與黃金或英鎊發生聯繫。惟兩者之中，何所採擇，則將由何方貸款中國，以作新貨幣準備以為斷。關於貸款一層，倫敦市場上可能性較大，故倫敦金融界期望中國貨幣必可與英鎊互相聯繫。此事一旦實現，則於英國出口商人極有利益，蓋商業中匯兌漲落之危險，從此可以避免也（一九三五年四月三日哈瓦斯社倫敦電）。上面一段話已經把英國金融資本家為什麼要發起召開貨幣會議的心理，描寫得非常透澈。在他們看來，日圓集團是不可能強拉中國加入的。至於美元，則用「美國貨幣政策，尚在試驗階段，亦不穩定」一句話，把他們最強的敵人輕輕撇開。他們只留着一個目前已經無能為力的金集團來做陪客，（我們知道，法郎帝國也並不是不想染指中國，例如上海的法文日報還鼓吹中國向法國借款，加入最為穩定的法郎集團。只因金集團本身的式微，以及歐洲情勢緊張，不容牠多管門外事吧了），安安穩穩地得出一個

「中國貨幣必可與英鎊互相聯繫」的樂觀的結論。

後來，根據各方面的消息（例如哈瓦斯社六月九日倫敦電），英國發起召開的貨幣會議，因為跟各關係國談判的結果，認為此項會議無正式召開之必要，而作罷了。這裏自然是因為日本方面堅決反對的緣故；當時倫敦傳來的消息，日本是拒絕參加該項會議的。

英國見日本反對開會，就「順風轉蓬」，改用派員赴華，調查中國財政金融的辦法。據當時的傳說，除英國派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羅斯來華以外，美法意諸國都要選派要員到中國調查。甚至說日本也將派有力代表，共同來華考察；這無疑是偏面的宣傳，日本是決沒有跟在英美之後，來華調查的必要的。就是美國，也「只聞樓梯响，不見人下來」；南京方面傳稱金陵大學教授卜凱，即奉命在華調查，其任務與羅斯爵士相等云云，大概也不見得是事實。法意兩國對目前的問題更隔了一層了。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各國代表來華調查，恐怕也只有英國在那裏「起勁」吧。

事實所表現出來的也正是那樣，各國代表光臨中國的也只有英國金融資本的代表羅斯爵士。

羅斯最初的行程預備經過美國，不過最後終究改由加拿大到日本，再從日本到中國了。羅斯為什麼不經過美國，而

要先到日本？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而這個事實却表現了英國對外政策的祕密。我們知道，在現在的資本主義世界裏面，英美帝國主義的對峙是一個基本的對立，英鎊和美元的對立，就是這種對立的一種表現。英國在遠東方面一向是拉攏日本，反對美國的。這就是說，日本在某幾點上雖然也是英國的對手，可是在反對美國這一點上，英國却可以聯合一個較小的敵人來向牠最大的敵人進攻的，這是第一點。其次，從「九一八」以來，遠東已經換了一個天下了，日本已經以一個口頭上的主人，變成事實上的保護者；計劃中的「田中奏摺」，在事實上已經可能產生一個「天羽聲明」，甚至產生最近日本駐華北軍多田司令的「華北政策」了。這一點，在英帝國主義是不能不考慮的。英國在華的利益，事實已受到致命的威脅；英國資本家是不能放棄在華的利益的，因為這種放棄，無疑就是英國在遠東勢力的總撤退。中國不保，難道英帝國的生命線——印度就能夠安全嗎？這裏我們看到英日矛盾的尖銳化。

美國，不錯，依然是牠最大的敵人，而可以作為友人的日本，却已變成一個心腹之患。英國的統治者該怎麼辦呢？

這樣想吧，現在所談的是一個遠東問題，而日本是目前遠東的主人翁。在這裏，英美如能結成一個聯合戰線，共同

對付日本，本來是一個上策，無奈英美之間的對立太尖銳了，過去的經驗，也證明這個聯合戰線頗有一點困難。英國想用武力來對付日本吧，可惜牠的實力，現在已經擔當不起這個英勇的使命，特別從「九一八」以來，日本的力量已擴張得很多，英國在遠東，幾已無力與抗。關於這；英國海軍界的權威早已這麼估量過的了。尤其，在目前意阿問題鬧得這樣兇險，英意雙方已經都到「箭上弦頭，不得不發」的時候，莫說英倫的艦隊不能開到遠東，英國駐在遠東的軍艦還要紛紛調防紅海地中海一帶。在這時候，英國在遠東方面正是防禦最弱的時候，牠還能夢想什麼跟日本武力相見嗎？

上面說過，英國對於牠在遠東的利益是不能不保持的。然而牠決沒有力量，用「硬」的辦法來對付日本的威脅。那末，它除了跟日本妥協，希望在日本的掩護之下，保持牠一點在遠東的利益，還有什麼別的路走呢？在這裏，我們所見到的，一面是英日矛盾的尖銳，一面是英國勢力的衰弱，因此不得不乞助於日本。

英國這種遠東政策，我們可以從英國外相霍爾在下院所發表的演說（一九三五七月）中看得非常清楚。他說，「英國政府深信欲保持中國秩序安定，迅速進步，則第一步必須先促進中日兩國之良善關係，第二步則應使中日兩國與抱同樣

利益及目的之其他各國（首先指英國——著者註）共同合作而後可」。再說，「最近華北事變發生，使英日兩國友誼偶起波瀾，令人爲之不安，此層余苟不提及，則對吾日本友人，殊失誠信之道。然余敢深信，令人憂慮之一章，今已結束，英日兩國友誼，今後必可繼續發展」。同時，更進一步說，「維持門戶開放之原則，並完全承認中國有自行控制其國家運命之權利，二者將始終爲英國對華政策之廣大基礎」。霍爾在這裏把英國一面要跟日本妥協，一面又不要日本獨佔中國的政策完全表露出來了。

不消說得，英國這種政策本身是包含極大的矛盾的。牠要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原則，或者說，牠要不讓日本獨霸中國，就不可能（至少很難能）跟日本妥協。這種矛盾，我們以羅斯這次西來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英國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羅斯爵士八月十日就從倫敦啓程來華。據當天哈瓦斯社倫敦電訊，稱：『負責方面相信英國政府派財政代表羅斯爵士赴中國調查，其主要使命，可分爲兩項——一則謀穩定中國之貨幣，二則使南京政府獲得國際借款，由各外國政府予以担保，俾增強中國政府之地位。就第一項使命而論，負責方面相信中國貨幣可與英鎊發生連繫，但如確定中國貨幣對英鎊之比價，則不特保障此種比價，

需款過鉅，且足以危及英鎊集團，殊屬不易辦到。此外，似可模仿阿根廷貨幣「貝沙」之辦法，以英鎊作為表現中國貨幣漲落之尺度，即作為中國標價基準，如是則當屬可行。又此間金融界人士相信，唯有中國經濟復興，中國鐵道借款方可恢復償還本息，……英國所以主張由國際借款中國，以供建設費用，其故實在於此。唯此兩項計劃，不免遭遇各項困難，第一即為日本政府之反對態度，此層羅斯爵士當力謀加以克復，彼將遊說日本政府，俾瞭解英國此項計劃，絕無政治背景；其目的僅在改良中國之商業及財政地位，而日本對華貿易當首蒙其益也。

果然不出所料，「日本政府」對於英國這種計劃，是抱「反對態度」的。所以當羅斯爵士於九月上旬一到東京，和外相廣田，藏相（財政部長）高橋懇談的時候，儘管他聲明「此行任務純為調查中國經濟，絕無政治任務」；儘管他說，「英政府擬俟本人調查完畢，獲得恢復中國經濟辦法後，即與日本政府聯絡，實行對華政策」；同時儘管他否認，「英國並無單獨借款之意，並願與日本合作，進行對華各項方針」，可是東京的政治家們總是搖着頭，要請英國政府對於「具有特殊性」的中國經濟和金融，加以慎重的考慮。他們反對英國要中國加入英鎊集團，反對英國借款中國，同時拒絕日英

聯合借款，他們堅決地指明，中國經濟和金融的救濟，要以政治的安定為第一義，言外之意，中國的一切，要先讓日本在政治上得到完全的支配以後，然後可以談到改進。

羅斯爵士提出關於中國門戶開放的問題，這就是要日本不獨佔中國，對於英國的利益須作多少讓步。日本回答說，日本的商品正感銷路太少，日本的人口正嫌密度太高，所以要叫日本「開放」中國的門戶，英國先應當開放大英帝國一切殖民地和自治領的市場，並且一部份地方容許日本移民。日本這種要求無疑是想摧毀英帝國的生命線；同時英國對日本的要求也很少實現的可能。

羅斯爵士在日本差不多吃了一鼻子灰，至少是並沒有受到怎樣「友誼」的招待。結果，爵士最後敷衍了一下，說等調查中國以後，再過東京磋商決定吧。

羅斯雖然在「敗興」之中離開東京，可是當他在九月下旬光降上海的時候，却被熱烈的歡迎裹住了。日本報紙說，中國人之期望羅斯，有如大旱之望雲霓，這話雖太尖刻，然而中國一部份當局和金融領袖畢竟以為羅斯爵士總能多少給他們些出路的。目前羅斯的調查工作已經在上海華懋飯店正式開始。借款的談判還在進行之中。日本人反對的聲浪，不單沒有消失，反在一天一天高漲。傳說羅斯爵士建議中英共同

承認滿洲偽國，以爲日本允許英國對華借款的條件；據日本軍部的意見，這種條件可算是無用的長物，不能「算數」，那末羅斯爵士苦勸中國對於承認偽國問題，作正當處置（見上海各日文報羅斯抵滬時談話錄），也只算白費一番苦心了。至於近來倫敦傳來消息英國金融家視對華借款爲笑談，那不過表現事實確有困難，同時對日本作一種姿勢吧了。

羅斯爵士遊說日本，沒有成功，目前日本政府的「反對態度」，好像終究不易「克復」，所以傳說英國現正進行單獨借款。同時據日本方面的消息，關於貨幣問題，先想由匯豐銀行設立匯兌基金，來安定中國的幣價，這樣漸漸地聯結到英鎊方面去。這一着假使真個實現，那末中國在投資，貿易甚至政治上，可以提供英國很大的便利固然不消說得；假若英意關係鬧翻，世界大戰起來，那中國還要直接地替英鎊慘落負責呢！

在另外一面，華北日本駐軍多田司令又在分發小冊子，確立他的華北新政策了；他要求華北五省在政治，財政和經濟上脫離中央，同時建立獨立的行政單位。東京方面也在確立所謂以「中日經濟提攜」爲主幹的對華新政策了。羅斯爵士跟中國當局的接洽如果得到相當成功，那末華北甚至華南（廣東汕頭揭揚已有日艦在借端示威）恐怕又會聽到日本的砲

聲了。

在這時候，美國的態度是很可注意的。牠在目前英日在華爭鬥得轟轟烈烈的時候，牠竟保持着空前的緘默。這當然是美帝國主義的一種策略。這種策略的祕密無甚希罕，不過是要鷸蚌相爭，自己坐收漁人之利吧了。美帝國主義著名的代言人李潑孟（Lippmann）關於中國問題曾表示過他慷慨的態度，他說：「美國新的立場，必須以下列事實來考慮：美國在遠東的利害，僅及英國的六分之一。美國在列強對華投資總額中只佔十六分之一。……美國在華北的利益是很少的。在上海，英國的利害大於美國七倍；華南連香港在內，美國的利益只及英國四分之一」〔Herald Tribune 一九三五、一、二二〕。這是告訴英國，日本獨佔中國的傾向，你所受的打擊是頂大的；至於我却不大相干。在這裏，他要我們相信美國不想向中國侵略，是不可能的；可是他能叫我們相信，美國讓英日去正面衝突，自己袖手旁觀，倒是可能的。美國表面上要放棄菲律賓，不是這種策略的表現嗎？而現在，在貨幣問題上，牠又沿襲了牠的「故智」。我們要相信，牠之待時而動是必然的。

帝國主義列強都想把中國的貨幣淪為牠們的附庸，這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大概很清楚了罷。那末，中國自己怎麼辦

呢？

——就那樣淪為帝國主義貨幣的附庸呢？

——要「自力更生」，要求獨立的存在呢？

中國政府從一九三四年白銀問題發生以後，為要解救自身的財政危機起見，確乎已經採取很多「驚人」的方案。中間最重要的一着，自然要推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的改組和擴充。目前這三大銀行已成「三位一體」，作為政府的財庫了。三行改組之後，因為大部份現金準備已經集中到政府手裏，所以政府方面就用全力集中發行，一面限制其他銀行發行鈔票，一面擴充中央銀行的發行，並且在香港，漢口，重慶等處設發行分局，用最大的力量推行中央銀行的鈔票。同時中央軍隊還可以擔任推行中行鈔票的開路先鋒，「師之所至」(過去如四川、貴州、甚至雲南)，「中行鈔票隨焉」。一九三五年九月，四川當局遵中央命令，把全省地方銀行所發鈔票，照八折用中央銀行鈔票收回，限期肅清。當時四川貿易受了很大的打擊；特別是一般農民，他們手頭都是些「地鈔」，二扣的打擊，已經不少，除此以外，他們還要經過重重的回扣呢。這樣，民衆的不滿就日甚一日，重慶鄰近的縣份，有些地方銀行的辦事處還被人民打毀呢。

中國政府這樣雷厲風行，推廣中行鈔票；同時因為財政

竭蹶，就有人推想政府會走通貨膨脹的路。政府當局對此雖然慎重否認，屢次宣布政府要用全力安定貨幣；可是傳說的力量畢竟太大了，一般人終覺得「惶惶如也」。特別是一般靠工資過活的工人，靠薪水過活的職員，靠餉銀過活的兵士，他們聽了通貨膨脹，說要把他們原有的薪工打上一個折扣（因為貨幣跌價），同時物價又要騰貴（也因為貨幣跌價），他們還能過活嗎？莫說這些大多數的下層人民，就是一部份銀行家們也覺得這種辦法不妥，因為中國如果真正實行通貨膨脹，那就等於濫發紙幣，東三省的奉票和山西省的晉票，都是最好的先例。到那時，莫說一般平民過不了，就是銀行，錢莊，商舖，也要因為民衆極度的不安，市場的澈底破壞，而紛紛關門的。

此外，列強資本家對於中國實行通貨膨脹也是反對的。帝國主義列強儘管牠們自己願意行通貨膨脹，貶價傾銷；儘管牠們在華的銀行要拚命增加發行；然而這些都和中國自行通貨膨脹是不相干的。牠們怕自己投資的損失；和貿易的逆轉，所以對於中國通貨膨脹，絕對不能贊同。你看英國的金融資本家對此問題的意見吧：「此間（倫敦）金融界對於中國通貨膨脹之謠言，意見不一。大多數人以為中國前曾有此謠言，並未實現；今日中國狀況，並未較當時更為惡劣，預料

在英國經濟專家羅斯爵士將遊中國之時，中國未必在其通貨上作新嘗試也。但亦有人以爲通貨膨脹終不能免，中國現已着手以人爲的方法，固定中國幣價，使在世界銀價之下。目前謠言，殆爲貨幣委員會建議鑄造鍍質輔幣所致。衆覺此種建議，未必能輔助中國之財政，公共信任缺乏之增甚，或爲大規模代幣計劃之預兆。衆信此種謠言，勢必鼓勵投機，損害事業，中政府若發表負責言論，消滅謠誑，則殊可歡迎也」。(路透社倫敦七月三十一日電)。

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正式實行通貨膨脹，確然也表示反對，可是他們畢竟力量大，威勢足，假若中國真個實行通貨膨脹（公開地或秘密地），那末外國的貨幣——尤其是英鎊，或代理英鎊的港幣，就會像日圓之在吾東北，英鎊之在吾廣東，東方匯理銀行鈔票（法）之在雲南一樣，馬上就會流到長江流域各省，作爲主要支付的工具的。這樣看來，中國的通貨膨脹，除了對於財政金融是否能夠真有幫助，還是一個疑問之外，牠對於一般下層的人民，定是一種空前的禍水；同時牠又會更快地促成中國貨幣之殖民地化，那更是無疑的了。

因此，我們說通貨膨脹決不是個「自力更生」，爭取中國貨幣制度獨立存在的大道。

其次，有人說中國可以採取金本位幣。中國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要求美國當局緩購白銀的時候，也提出一個近於滑稽的辦法——就是用中國的白銀掉換美國的黃金；這樣來作實行金本位的準備。誰都知道，中國是用銀的國家，黃金的儲存可以說少得可憐；再加上近年對外貿易不利，對外支付的黃金，一年多似一年。以這樣絕無黃金準備的國家，要想實行金本位制，莫說人家會笑我們不識潮流，逆水行舟；就是我們自己，連這樣的夢也都不敢做的。

此外，很多人主張中國採用虛金本位。這種辦法是否能夠辦到，我們暫且不談；假若中國真能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一種虛金本位（事實上恐怕不要自己的力量，人家會替我們這樣辦的），那末在通貨管理盛行的今日，這種名義上獨立的貨幣制度，不是和金集團連結，定是給美元集團「強姦」，要不然便只有投到英鎊的懷裏去了。因為在虛金本位之下，中國的貨幣總要用一種強有力的外幣來做標價的尺度的；你用什麼做標價的基準，那末你就跌入誰的陷阱裏面。因此，虛金本位也決不是「自力更生」，獨立存在的貨幣制度。

那末，中國的貨幣，到底怎樣才能維持其獨立的存在，怎樣才能不淪為人家的附庸呢？

我們以為，這個問題並不能從貨幣本身來解決。誰不知

道，列強對於中國貨幣權的爭奪，僅是帝國主義宰割中國民族的一幕；而中國貨幣本身的脆弱和紊亂，也只是中國整個經濟結構所必然產生的現象之一。誰想單從貨幣本身來解決中國的貨幣問題，誰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庸醫。只要中國民族能夠真正獨立，只要中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真能大規模的發展，只要對外貿易的平衡，能夠急激地好轉；只要黃金的生產能夠大量的增進；只要國內的貿易因為大眾購買力的擴大，而飛速進展，那末中國的貨幣就不但能夠維持牠的獨立，那些帝國主義者亦不敢來覬覦了。在這裏我們除了英鎊美元，法郎和日圓之外，對於那在社會主義的蘇聯日益鞏固的盧布，是有研究的必要的。不過，我們這裏因為篇幅有限，不能多說了。

第四章

各派幣制改革論之介紹及批評

第一節 最近之各派幣制改革論

保存着濃厚的封建割据意味的中國貨幣，不但是民族資本發展的障礙物，而且有時也是帝國主義開發中國市場的障礙物。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勾結，統一之中是有矛盾的；那中間的條件，就是要使封建勢力成爲足以妨礙民族資本的發展，而不至妨礙帝國主義資本勢力的發展。比方，厘金是封建形態的征收制度，假如厘金的征收，兼及于外商的進出口貨物，帝國主義便要反對；但是，在外商的進出口貨物可以用簡單的子口半稅代替厘金，而使厘金單純的成爲阻害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工具的條件之下，帝國主義便要贊成「厘金的存在」。關於貨幣問題，帝國主義在華的資本勢力，

還有牠內部的矛盾。比方，對於封建性的銀兩——代表的是上海規元——外商銀行和貿易商行，便有不同的態度。前者因為銀兩事實上已經在牠們的勢力支配之下，而且牠們也可以利用「加水」的名目取得利潤，便要反對廢兩改元；後者因為計算上的麻煩和「加水」的損失，便要贊成廢兩改元。不過，對於內地雜色貨幣的阻礙，在華外商是一致反對的。尤其，爲了牠們的資本和商品輸入中國的便利計，牠們要贊助中國採用金本位。因此中國幣制改革問題，幾十年來成爲在華「中外人士」的討論標的。

在中國幣制問題的論壇上面，赫德，胡惟德，精琦，汪大燮，衛斯林諸氏的虛金本位計劃，以及曹汝霖氏的金券條例，都已經是過去的陳跡了。代價甚高的凱末爾氏的逐漸採用金本位計劃，也不過留作理論家引證的資料。事實上自從一九三〇年金貴銀賤風潮發生以後，國人對於貨幣問題研究的熱烈，可謂空前：「五花八門」的主張，即使專家也不易作成一個有體系的分析和批評。這種種的主張有許多因時代倏變，已成過去；而依然存在和應時新興的，也不在少數。現在就把後一部仍然引人注意的，擇要加以介紹：

徐青甫氏在他的經濟革命救國論中，主張以「虛糧本位」代替金銀本位，在國內用信用制度來代替貨幣；國民可以

把他們的財產——不動產，動產和貨幣都在內，提供到政府設立的「公信所」裏面去，公信所照估價給他們一種信用；在信用額度內，他們可以發行支票，以爲支付之用。這樣政府可以經過公信所的作用集中全國的金銀，以供國際收支之用，而人民也可以化呆爲活，不至有籌碼枯竭之憂。

劉冕執氏的「能力本位制」，曾于去年經由焦易堂氏，用錢幣革命名義向國民黨四中全會提出。他主張的要點，是人民將以自己所能供給的能力，發行能力通用券，但須先得保證委員會的保證；無論財產多寡，非以自然人的能力價格，不能發行能力通用券，但國家和地方政府，以及人民公益機關不在此限；人民領發額至多以其生活根據——有收益之財產或全年工作收入——十分之一爲限，政府及公益機關至多以其生活根據——歲入或產價——十分之五爲限。他認爲國內現金，不敷造產之用，所以應該把金銀集中于國際匯兌銀行，作爲國際收支之用；而在國內，則以能力通用券爲流通。

最近惹人注意的幣制方案，要算是閻錫山氏的「物產證券」辦法；褚輔成氏的貨幣革命論，大致和閻氏的主張差不多。閻氏主張的大意，是由政府發行物產證券，收買人民的物產；政府取得物產，即以供物產證券準備之用，人民取得物產證券，可以換取所需，以及作通常支付之用。褚氏則主

張發行「貨物兌換券」，貸放與農民，以救濟農村金融之枯竭。

目下最盛行的幣制主張，要算是管理貨幣了。在管理貨幣論者的領域當中，派別也是十分的紛歧。有人主張用生活指數為標準，把貨幣價值穩定起來；也有人主張以物價指數為標準，穩定貨幣價值。有人主張採用英鎊本位，因為牠是世界上管理得最有成績的貨幣；我們只須以牠為標準，別人就已經替我們管理妥貼了。也有人主張維持銀本位，而取消銀幣的自由鑄造，以操縱貨幣價值。

大概，貨幣管理者共同着眼之一點，就是所謂貨幣購買力問題。他們認為經濟恐慌中的主要現象物價跌落，反過來說便是貨幣購買力的高漲——一圓大洋在目下，可以比從前買到更多的商品了。倘使現在有一種方法，能把貨幣的購買力穩定起來——以前要一圓大洋買得到的商品，現在和將來也要一圓大洋才買得到，——目下的經濟恐慌，就可以消滅。

他們所主張的手段，大抵都以貨幣數量說為根據。貨幣數量增加了，貨幣的價值——貨幣的購買力——自然就減少。反之貨幣數量減少了，貨幣的價值自然就增高。簡單的說，就是在物價問題當中，一面固然有商品的供給需要定律——供求律，另一面還有貨幣的供給需要定律，而貨幣的供

給需要定律，便是貨幣數量說的根據。不過，目下的貨幣專家，往往是要偏重貨幣的供給需要關係，而忽略了商品的供給需要關係的。

因為目下的問題是物價跌落，所以，一般的管理貨幣論者的管理方向，是用增加貨幣數量的方式壓低貨幣購買力——這就是所謂有限的通貨膨脹。在理論上，假如物價高漲，自然，也應該反過來減少貨幣數量以提高貨幣購買力。但是，那往往是一句空話，真個一旦物價暴漲了，他們也許是只在慶祝「恢復繁榮」的聲浪中，希望物價「更上一層樓」；所謂消費大眾的損失，他們往往是不會計及的。

改用金本位是目下高唱入雲的一種幣制改革論；除了上文所說的改用英鎊本位以實現任人支配的管理貨幣之外，也有人主張採用以純金為基礎的海關金單位為本位。那樣，只須對於目下流通的銀本位鈔票，不再兌給銀圓，而改按定率兌換海關金單位，問題就已經解決過半了。自然我們也不能——而且也不必——鑄造金幣，而金單位不過是作為一種計算本位。那就是說：假如有人請求兌換的話，政府可以兌給他金條，或者兌給他外幣匯票；不過金條的分量，是照金單位的金量比例計算，而外幣的數目，是依照那種外幣和金單位間的比價計算出來的。又，假如兌給外幣的話，究竟只

限于兌換某一種外幣，或者政府有權兌換給幾種外幣中之任何一種，或者請求兌換人可以指定幾種外幣中之任何一種，那都是技術的問題了。在改革幣制的時候，相當的金準備或外幣準備，自然是需要的；然而白銀依然可充作準備之一部。現在白銀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是不比從前了；白銀準備差不多隨時可以賣出，變成外幣，而並不見得有很大的市價跌落的危險。上海目下的存銀，雖然已經由去年五月間之五億九千萬元減到三億三千萬元，但是和上海各銀行的發行鈔票額——約三億八千萬元——比較起來，依然是不算少。其他各重要商埠的發行現金準備，據說也都在六成以上。這樣，中國假如改金本位的話，似乎不一定需要借外債以充準備之用，只須把一部分的存銀兌成金條或者外幣，就行了。事實上，銀行的發行準備中，已經含有相當數量的金條。

除了上述的種種主張之外，也還有人主張很簡單的把現有銀幣的成色，減低若干成。在這種方式之下，銀圓的改鑄就成爲問題；因此便有人認爲不必改鑄銀圓，而很簡單的改以銀條作兌現之用。那樣，兌現自然只限于一千元以上的大數，而貨幣制度，就變爲銀塊本位了。

第二節 貨幣在經濟體系中作用的評價

流俗經濟學家之所以流俗，並不是偶然的。倘使一種制度的危機，還有可以根本救濟的方案，當局者自然願意提出根本的救濟方案；假如一種制度已達「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之境，局外人固然是主張聽其滅亡，然而局中人仍然不能不用強心針和興奮劑，使牠得以「苟延殘喘」。目下各國的流俗經濟學家，固然也有許多是本質上，就是流俗，而也有不少是已經洞見危機的內容，然而不敢揭破危機的內容。假如真個盡情的揭破危機的內容，那下文就只有及早預備後事；這在處旁觀地位的醫師，是沒有什麼的，而在病人的後裔，却要被人指為忤逆。這是一部分流俗經濟學家的隱痛；易地而處；是應該給他們一些原諒的。

目下各國的經濟危機，不是貨幣的供給需要問題，而是商品的供給需要問題，不是一時衰落，而是現制度最後的蛻化，這是比較能夠高瞻遠引的人，都會明白的。利潤的取得是資本主義的基礎；然而，利潤的存在，却是商品供給和需要中間的鴻溝。資本聚積的數量愈大，利潤的鴻溝也跟着愈遼闊，商品的供給需要便益發無可調和；消費大眾只可對着隔岸的過剩商品，望洋興歎。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因此便主張改正分配，減少一部分的利潤，移作消費大眾的購買力。但是，同時有人反對，認為把利潤化為購買力之後，資本

的積蓄便無由增加，而社會的進化便要停滯。因此，羅斯福的「頭腦托辣斯」，就進一步主張把一部分用租稅方式奪取過來的利潤，移作建設公營產業之用。可是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利潤的分配關係，是十分複雜的，除了上層的資本主，地主和企業家之外，還有中層的知識份子；除了工業品的生產者之外，還有原料的生產者。在一疋陰丹士林藍布的價值當中，究竟包含多少棉花生產者的利潤，多少紡織工業者的利潤，多少染色工業者的利潤，以及多少棉花居間商和棉布居間商的商業利潤，恐怕即使是一個成本會計專家，也不容易加以計算吧？最近，我們不是爲着上海電話公司的利潤問題，起了爭執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經以契約允許該公司保持年息一分的利潤，但是，因爲牠是國際托辣斯的一個細胞，股本固然屬於國際托辣斯，材料的購買也歸國際托辣斯獨占；國際托辣斯只須把材料的賣價提高，上海電話公司表面上的利潤便要減少，牠就可以根據契約要求增加電話費，以榨取更大的利潤。要之，在資產階級的政權之下，而希望消滅利潤，本來已經是「與虎謀皮」。即使真個有這樣理想中的超然政權，能以消滅利潤爲己任，但是一面保留着私有制度，而一面在千頭萬緒的私有財產中去計算各人的利潤，也是絕對不能實施的一個計劃。但是，流俗經濟學界的

理論，是不能超過某種限度的像羅斯福的「頭腦托辣斯」一流人物，在流俗經濟學家中，已經算是登峯造極了。

在貨幣問題上，鑽牛角尖的人們，往往也逃不出流俗經濟學家的領域。他們不但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涓滴，不見江河，而且還要認樹木大于森林，涓滴大于江河。本來，我們也不能抹煞貨幣在現社會中的重要性，然而決不能認為貨幣問題的解決，就是整個社會問題的解決。目下經濟危機的焦點，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生產關係的基礎私有財產制，不可能再容納目下的偉大生產力。為甚麼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一面有飢寒交迫的失業羣衆，而另一面有牛乳傾河，咖啡投海，棉麥充薪，工場鎖閉的現象呢？這是利潤做了供給和需要中間的鴻溝，也就是私有財產制做了消費大眾和少數擁有生產手段者中間的壁壘。假如生產手段是公有的財產，生產的結果——商品——就可以分配給大眾享用而決不虞其過剩，有計劃的生產也決不讓某種商品有過剩之憂；工廠決不至于鎖閉，而應該讓牠儘量生產以為公共消費及公共資本積蓄之用。恐慌又何從而生？但是，這個問題的解決，單靠貨幣制度的改善能發生有力量的作用嗎？

通貨膨脹可以刺激購買力。然而不能消滅購買力衰退的原因。購買力所以不能跟上生產力，是因為利潤的存在，上

文已經說過了。保持了私有財產制和憑依在私有財產制上面的利潤，而只是一時的給與消費大眾以些微的購買力，這就好比是給病人一注強心針而沒有停止他身體上的漏血，能有什麼效果呢？那所給與的一些購買力，不久就要因為利潤的剝削，而化為烏有了。

說到中國，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有牠相對的特徵，然而我們不能夠承認牠和別國有絕對的甚至相反的特點。假如幣制改革不能解決別國的社會問題，我們能夠希望牠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嗎？

中國目下種種式式的幣制改革論，都逃不出是通貨膨脹論。糧食本位，能力本位和物品本位三者，着眼于農村金融；他們的共同目標，是使人民在產品或者勞力尚未賣出之前，就能取得貨幣，使金融不至枯竭。其他各種幣制改革主張，主要的是着眼于都市物價之跌落以及政府財政之困難；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抑低幣價，抬高物價，刺激人民的購買，同時使政府能以改革幣制的餘利，渡過目下的財政難關，將來更可利用低廉的資金市場，減輕債務上利息的負擔 而且以便于發行新債。

我們所應該顧慮的，第一，是通貨膨脹之後，所增加的假如僅僅是人民的消費力而不是人民的生產力，那是十分危

險的。關於這點，徐青甫，劉冕執，閻錫山和褚輔成諸氏，似乎都已經見到，而且都以增加生產力為前提。貨幣在一定限度之內，可能增加生產，是不能否認的。如閻錫山氏所提出雇工，墾植以及修治水利之類，貨幣的功能是不能抹煞的。但是，目下農村金融的枯竭，究竟由于生產力的衰退，還是由于舶來品，工業品，以及軍閥，官僚，豪紳們的超經濟的剝削，却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農民生產力年來是否衰退下去？這是一個不容易確答的問題。依照發表的統計，大致是糧食的生產減退，而原料的生產增加；不過前者的減少；甚于後者的增加。可是，這種資料的準確性，是有問題的。

在輸入物價和輸出物價剪刀形的發展上——就是輸入物價近年來的低落，不如輸出物價之甚，——我們可以知道舶來品對於農村剝削的加深，是鐵一般的事實。在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剪刀形的發展上——就是工業品價格的低落，不如農產品之甚，——我們更知道工業品對於農村剝削的加深，也是鐵一般的事實。此外，年來關稅，鹽稅的增高，統稅的加課，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稅重重剝削，農民對於捐稅負擔的加重，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這幾種原因，恐怕便已經足以組成農村資金外流的趨勢——至少這幾原因的力量，要比

農民生產力的衰退還要大一些。而農民生產力的衰退，往往也由于不勝苛捐雜稅的負擔。

我在討論農村金融問題的時候，曾經有這樣的見解：假如金融業通融給農民以消費之資，那不單是害了農民，而且害了自己，因為那種債權是不容易收回來的；但是，假如農產物的市價不穩定，農民的收益就沒有保障，為生產而通融的資金，便要因農作虧損而變成消費。通貨膨脹對於農民的利害，可以說是差不多。假如我們對外不能減少舶來品對於農民的剝削，對內不能管理工業品和農業品的價格，以防阻工業品對於農民的剝削，同時減輕農民的捐稅負擔，那末就是給他們一些可供生產之用的資金，結果也只有使他們多受一些損失罷了。

本來，中國民族革命現階段的任務，對外是阻抑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是解決土地問題和實行重要產業的國營。這些問題，徐青甫和閻錫山諸氏也都已經很大膽的提出。而主張以幣制的改革為實施這些問題的主要手段。所以，他們對於舶來品和工業品所加于農民的剝削，理論上似乎不是辦法。所可惜的，就是革命決不是一件和平的事，經濟更不能離開政治而單獨革命；如果沒有一個轟轟烈烈的革命高潮，這種反帝反封建的目標，是沒有方法可以達到的，就是真個用

英雄的手腕來硬幹一下，從整個不革命的局面當中挑動一個局部的革命，恐怕結果也是徒然使軍閥，官僚和豪紳們，能用新的口號加重農民的壓迫罷？所謂「省統制經濟」，目下不已經成爲「大爺」和「小舅子」們的發財工具嗎？

因此，許多上層分子讀了徐青甫，閻錫山，劉冕執……諸位的文章，便搖頭不迭，認爲過激。而我們呢，雖然不是那樣的固執，也終覺得他們是「救國有心，實行無術」！結果恐怕也不過是把烏托邦思想，重述一番而已。

想用通貨膨脹手段解決都市經濟恐慌，也同樣的是拿枝節問題來遮掩根本的危機。在恐慌高潮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變爲過剩商品傾銷的尾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要變爲最低層的受壓迫者，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假如中國民族革命不遭失敗，我們現在也許已經可以用國家的藩籬拒抗外來的經濟侵略。然而現在，我們不僅是在經濟侵略之下，而且在政治，軍事……種種一切的高度侵略之下。這種種的侵略，造成目下全國經濟崩潰的危機；而所謂都市的經濟危機，不過是格外被人注意而已。這樣一個全民族空前危機，而說我們可以輕描淡寫的用幣制改革手段加以解救，天下那裏會有這樣容易的事情？

高估了貨幣的作用，或者提出貨幣問題來抹煞更根本的

問題，我們自然應該反對。然而，我們也不是說貨幣的改革完全沒有意義。爲了農民和民族工業的利益，我們應該減低幣價以提高物價，爲了進出口貿易相對的平衡，我們也需要抑低匯價以限制輸入刺激輸出，在國防的意義上，我們也許還需要使上海的存銀，變成海外的存款。不過，這種種的作用，都是一時的。倘使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國策做中堅，把中國民族由侵略和剝削中間解放出來；那末，這一注強心針的作用，便成爲「苟延殘喘」的結果。

第三節 中國幣制改革的主要條件

中國的幣制改革，已經成爲箭在弦上的形勢。是不是在幣制改革的上面，還有一個強有力的國策？那不是我們所能解答的問題。就貨幣以言貨幣，我們認爲下面的幾個條件，是必須注意到的：

第一、是和外幣聯繫問題。我曾經說過：假如中國加入美金集團或者英鎊集團，那在外交上，恐怕要發生應付爲難的問題，而就幣制前途着想，也成爲貨幣的殖民地化。自然，這是指我們以法令或者條約使我們的貨幣和別國的貨幣聯繫而言。倘使是運用匯兌政策，使將來的本位——大約是海關金單位——和別國的貨幣價值穩定起來，而依然沒有放

棄對於貨幣價值操縱的自主權，那是沒有多大的妨礙的。比方，日本的匯價，年來差不多是用每日金一圓等于一先令二辨士的匯價和英鎊聯繫；日本在事實上，變成英鎊集團之一員，然而沒有任何法令上以至條約上的束縛。

第二、是海外準備金的存放問題。假如我們的海外準備金，和別國以條約關係訂定存放的所在；那末，即使匯價上沒有條約的束縛，而因為準備金授柄他人的結果，匯價依然變成俯仰由人。譬如，假使我們因為條約的關係，要把所有海外準備存在倫敦，我們的幣價就無論如何脫離不了英鎊的支配。當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之際，海外準備金的存放，總以分散為得計。尤其不可有任何條約的束縛，免致將來外交上受了牽制，有動彈不得之苦。

第三、是匯兌政策操縱的機關問題。我們即使在幣價及準備金的存放上，都沒有束縛，而匯兌政策的操縱，却要授柄他人；那結果，貨幣權依然不能獨立。過去曾經有人主張中央銀行和匯豐銀行合作，維持匯價，我個人是十分反對的。

第四、是對於外人投資問題。我們並不反對外人對華投資，然而也不能盲目的無條件的歡迎外人投資。政治上的借款，用途和條件固然應該注意。經濟上的投資，也要為民族

企業保留發展的地步，不能使外資有喧賓奪主之勢。

第五、是健全金融市場問題。就是在這一次通貨膨脹當中，也要很迅速的建立起來票據市場和產業證券市場，使民族金融體系當中，有現代的短期資金及長期資金市場。否則膨脹通貨的結果，假如依然是援照往例，徒爲租界地產及公債投機「推波助瀾」，甚至爲在華外商產業作「錦上添花」之用；那末，「一夢黃梁」，醒來還是「依然故我」，而民族前途，已陷于「形勢日非」之境。

此外，幣價抑低的程度，似不宜于過大；否則物價暴漲，要使人民生活，感受重大的壓迫。而在改革幣制的過程中，財政上應該利用自然的善果，努力平衡預算，而不能以通貨膨脹爲財政膨脹的手段；否則財政膨脹要成「積重難返」之勢，而國家信用動搖的結果，幣制改革要成爲失敗。

這些，都不過是，就貨幣以言貨幣的問題；爲民族前途計，自然還是十分不夠的。

第五章

新貨幣制度的分析

在第三章，我們曾經對於「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裏去」的問題，作了種種論斷，並且對於中國貨幣制度獨立存在的條件，也曾略加說明。那時候，中國的金融界，不，中國的整個經濟，好似滿天瀰漫着黑雲，究竟是晴是雨，是不容易下一個肯定回答的。現在，這個問題得到一個分曉了。這個分曉就是十一月四日財部所公佈的新貨幣制度的命令。當這個命令發佈以前的三星期之間，中國的金融市場上散佈着一種通貨膨脹的流言，接着便有標金狂漲，物價暴騰等現象。再接着政治上發生了一次重大的刺殺事件。這個命令就在這許多現象的交相錯雜之中出胎了的。新貨幣制度的內容，據財部公佈共分六項，歸結起來主要共有三點：

第一，定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

有完繳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的支付，概以法幣，不准使用現銀。至於其他銀行在十一月三日以前所發行的鈔票，限於兩年之內逐漸收回，在收回以前，仍可照常通用。

第二，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使法幣對外匯價可以按照目前價格穩定。

第三，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辦理法幣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事宜。

對於這個新貨幣制度，財政當局還有一個鄭重的說明：這既不是「通貨膨脹」，也不是「紙幣政策」，而是「通貨管理」。而其作用呢，據說「在十八個月以內財政預算可以平衡了」，外匯也可以從此穩定，因而國民經濟也可以復興，而且幣制也從此可以統一。自然，這個新貨幣制度無論其能否完成以上所說的使命，對於中國的整個經濟總不失其有歷史價值的。因為它究竟給予我們以一個問題的「分曉」了。我們對此加以怎樣的評價呢？

第一節 列強對華貨幣權爭奪的新階段

我們以為，首先，這是表示着列強對華貨幣權的爭奪，已經達到一個新階段。這新階段的主要內容是英鎊集團的勝利。羅斯福士畢竟沒有「辱命」。當八月間羅斯從倫敦啓程的

時候，他左肩負着「穩定中國貨幣」的使命，右肩荷着「使中國政府獲得國際借款」的任務。人們都以為爵士此行的使命是太重大了，他雖然頭上滿戴着高等顧問和專家的頭銜，可是要單身匹馬衝進到這風浪險惡的太平洋上來，恐怕爵士不是要勒馬回頭，便要說「愧再見英倫三島的父老」了。當他踏上東瀛三島的國土的時候，日本政府給他的只有「釘子」，更證明爵士此行前途的黯淡。等到他來到中國以後，那時候，大家雖然看到他在參閱許多由中國政府所供給的卷宗，曾經提出了幾個建議，可是也都被「老盟友」日本丟到垃圾桶裏去了。「羅斯爵士恐怕要辜負他祖國的使命了！」人們雖然沒有說出口來，心裏蘊結着這樣的斷語。然而現在怎樣呢？羅斯爵士却為他的祖國爭得了勝利的光榮。

羅斯爵士這個勝利可以說是空前的。他完成了他的祖國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所開始的，貨幣戰爭的巨大構築工程的一部。他成功了凱末爾顧問的金本位幣制條例草案所不能成功的企圖。凱末爾顧問的計劃，被金貴銀賤的風潮和「九一八」的砲聲震得發呆，羅斯爵士却並沒有被華北戰鼓的聲音嚇得後退，反而使他勇氣百倍。老大的英國在西方迫得金集團的饒將比利士投降以後，使金集團之皇——法國，在目前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在東方，羅斯爵士却於火藥氣薰天的當兒

，忍辱負重的安下了他祖國在遠東爭霸的礎石，起碼，英鎊集團已經在這次奠定了對中國貨幣權爭奪的上風了。

關於這次英鎊集團的勝利，我們可以舉出下列事實來說明。第一，據日本報紙的記載，這次英國借款確已成立；當然借款的方法並不普通。當羅斯抵滬後，曾命匯豐銀行及麥加利銀行提出中國人在該二銀行之存款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移交上海中央銀行。一方面，由中央銀行發行紙幣一億二千五百萬元，交送英商銀行，以備中國存戶提取存款。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即以此一億二千五百萬元作為四成準備，連同上述一億二千五百萬元，共發行三億七千五百萬元紙幣。並以其中之二億五千萬向正金銀行收買日本貨幣。除作為外匯之準備金以外，其餘購買軍火。自然，這個消息的確實與否，尚待證明，而且是日本方面所傳出的消息，我們更不能以此來斷定此事之十分可靠。不過關於借款問題，從去年年底即已喧騰一時，今年春天財政當局亦曾宣佈向英提起借款的請求。那時候，南京當局因為財政問題的嚴重，意圖向外借款來解救這個難關，是很自然的。現在，財政赤字更形嚴重，為了所謂穩定外匯，更需要一筆基金。所以說借款的舉動毫無根據，似乎也很難說。第二，這次新貨幣制度改革以後，財部所規定的匯率，英美日三國以英國為最有利。我們現

在先看看它們歷年來的變動怎麼樣：

	1931	1932	1933	1934	現定
英 匯	1 1,905	1 2,731	1 2,828	1 4,141	1 2.5
美 匯	22,138	21,486	26,055	33,911	29.75
日 匯	45.54	77.45	100.75	113.55	103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對外匯率能夠相當穩定，這樣，對外貿易和投資才不至担十分風險。這次財部所規定的外匯率，很明顯的是以英鎊的差額為最少。假使我們把現定的匯率，同本年十月份的來加以比較，此種形勢當更為明顯：

	英 匯	美 匯	日 匯
十月份	1 5,346	35,481	123,410
現 定	1 2.5	29.75	103

第三，據羅斯爵士自己及英國方面所傳，「中國政府這次決定改革幣制，他事前未有所聞；然而改革內容之一部（全部吧！）却與他的意見完全相符」！這是什麼意思呢？羅斯是愛他的祖國的，與羅斯的意見相符，還不是說於英鎊有利嗎？

對於這樣與他的「意見相符」的新改革，羅斯爵士以及他所代表的祖國，自然要給以盡力的支持，不，要努力促成

其實現了。所以，無論他對日本或對中國國民聲明他是沒有「預聞」也好，或是聯合着中國當局聲明並未成立借款協定也好，於發表新幣制的第三日，不得不透露出如下的言辭來：「中政府爲市況所迫，不得不毅然實施新幣制，而不待各國予以借款的保證。惟處中國地位的國家，借款殊有利益，今望將來終能賴其他各國家連日本在內之合作，而商妥辦法。……就大體而論，此舉實不足異，蓋放棄銀本位，早在意料中也」。對於羅斯說起來，此舉自然是不足爲異，因爲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了。不過假裝不知道說，中國能不借款而毅然實行改革，恐怕羅斯自己也要驚異吧！不，這是給以「精神上援助」(Moral support)的伏筆呵！

在發佈新幣制命令的同一日，英使賈德幹也發佈了一個禁用現銀的通告。通告的前半段，引了1890及1901年的治外法權案，以及1925年關於中國法幣授予來作根據；後半段接着便是說「爲了推行中國政府頒布之命令起見……凡住在中國境內之英籍法人或個人，如以現銀償還全部或一部之債務者，應以違法論。」於是，精神上的援助遂完成了第一步。

接着第二步，英商銀行匯豐麥加利等於七日在其他外商銀行拒絕和猶豫聲中，無條件的答應交出現銀。英國在什麼時候能夠有如今次這樣的遵守中國法權，允諾中國政府的要

求過呢？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和祖國的勝利呵！

日本看着英國這樣的勝利，自然懷着極大的憤怒。他明知道英國對華貨幣權的獲得，主要的對象並不是它自己而是美國。而且正如英國所宣傳的，假使中國對外匯率能夠相當穩定，日本可以同樣得到好處。然而當它正在積極推行大陸政策，正欲由華北而併吞全中國的時候，它感覺到英國這種舉動却是針對着自己的。事實上，不要日本「造謠」，就是沙遜爵士（發表鎊券計劃的沙遜）也已很明白的提供這個事實的口供了：「中國嚴守其目前之財政政策，則外匯將以現在之價格穩定，不再變動。即使日本鼓動華北之自治運動，亦不能損及穩定之效力……無論外表如何，中國將不致有何政治上之變動，中國政府目前實較向來更為有力。」是什麼人使中國政府更為有力呢？這是不用說的了。當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的前三日，華北風雲正在緊急之時，羅斯竟翩然飛到天津。我們且看他第二日是怎樣對記者表示：「風聞華北頗呈紛擾不安之象，有云三省將行獨立，有云五省將行獨立，今茲拋開政治立場，單就經濟關係而論，中國目前實不應有此局勢。任誰盡知中國經濟重心為上海。上海以外各市場，其經濟情勢又多與上海相關。假如果有數省脫離中央獨立，不但華南華中蒙其不利，即世界經濟市場，亦將感受

影響。」羅斯爵士的話鋒，顯然對着日本的砲口。日本獨占華北，不僅是損害中國的主權，而且也是對英國的不利呀！羅斯怎能保持緘默呢！

然而日本的憤怒並不因這種威脅而稍息。它記得羅斯到東京的時候是怎樣款待過他的，現在也應當用同樣適合的辦法來對付。東亞主人的光榮決不會因幾句花言巧語而犧牲的。他們想中國竟敢如此大胆！事前不通知東亞主人而擅行改制，是應該加以懲戒的。因為目前「中國適值表示自力更生之決心」的時候，「此舉結果，實反足以使中國方面之決心變為遲鈍了」。於是最先對中國改制之舉表示驚異，接着便是駐平武官的談話：「英國是否有不信行為，吾人必須徹底查明。若南京政府欲強制收回現銀，與華北立於共同利害下之日本，必舉全國之力設法阻止之。」適合着談話的行動，日商銀行接到中央銀行要求交還現銀的時候，認為無回答之必要，只將來函照收。大批的漢奸浪人四方收買白銀偷運出口，外商銀行公會開會時，日本亦公開拒絕交還白銀。但此還不足以表現武士道的精神，華北由拒絕白銀南運而醞釀獨立，日圓流通區域的計劃亦逐漸具體。計劃的內容是將朝鮮銀行在滿洲流通之金券逐漸收回，最先在天津普遍流行，再次則逐漸在華中的漢口流通。英國有巨大的資本誘中國當

局入彀，造成英鎊統治；日本難道不能用武力強迫中國造成日圓區域嗎？你如果說這是一種不大文明的手段，那末我給你一個「人民自治」的美名來給你瞧吧。

這時候，爭奪貨幣權的主角美國的態度是很夠玩味的。很明顯的，垣街的金融寡頭們並非不知道這事情的真相。他們，當新幣制改革令頒佈的同一日，已表示這個改革最可注意之點，是在「實際上已附從日益擴大之英鎊區域。華幣雖並非直接與英鎊聯屬，但中國在新制度下，惟一可以維持匯兌平衡之有效地點，即為倫敦。故華幣自當歸入英鎊勢力之下。」然而，它却始終抱着靜觀的態度。那末，美國就坐視着中國的貨幣權落入英鎊的懷裏而不予應付嗎？問題倒並不是美國想應付不應付，而是如何應付為最妥當。在第三章裏面，我們曾經說過，美國的白銀政策因為受到英國以退為進的戰術的結果，美國將取更和緩的步驟，把奪取貨幣權的過程延長。現在，中國這次貨幣改革，自然使爭奪的形勢急轉疾下，對於它，不得不取更加「穩紮穩打」的戰略。而且目前遠東的情勢是：一個對手把中國簡直快要整個鯨吞了，另一個對手則抓取中國的貨幣權以對抗之。貨幣權的失落固然使它感到切膚之痛，另一個併吞的形勢使它不得不權衡輕重而有所取捨。自然，它的白銀政策自然要繼續邁進，膨脹派領

袖湯麥斯曾經說：美國在下屆總選舉之前，每盎司白銀將漲至一元二角九分。可是，當目前遠東局勢英日正如鷓蚌相爭，而自己在許多地方的軍事準備尚未十分完成的今日，靜觀以待漁人之利，誰又能說這是退後的戰略呢！

第二節 經濟復興的幻夢一場

中國的貨幣已經投到英鎊集團的懷裏去了，這是一件「中外週知」的公開的祕密。然而却有許多專家和博士們在「懿歛盛哉」（真使人肉麻！）地說這是「劃時代的改革」，說因這個改革，中國的經濟從此可以復興！那末我們現在姑假定這個幣制改革是完全出於自動的行爲吧。

問題是經濟復興。經濟復興是工商業繁榮，農業生產恢復的意思。工商業怎麼能繁榮，農業生產怎麼會恢復呢？據說，祇要統制外匯，把外匯率壓低，並且使它穩定，這樣就可增加對外輸出，招致外資了。對內呢，因為現銀集中，通貨數量由政府隨時可以伸縮，物價逐漸趨於合理之上騰；另一方面因為外匯安定，投機者少，國內投資都可投入到正常的產業上面去，再加以中央準備銀行將給予各銀行以再貼現的便利，同時計劃創辦中的地產抵押銀行，也將使所有地產事業恢復起來。這樣資金流通可以圓滑，工商業也可以繁榮

，經濟也就可以復興了。顯然的，這裏的主要關鍵是外匯穩定。現在，我們先說外匯。

中國歷年的對外匯率是怎樣一種情形呢？我們先來對最先放棄金本位的，現在竭力幫助中國改革幣制的英國說吧。

1931年：1/0.004；1932年：1/2.766；1933年：1/2.824；1934年：1/4.100；1935年10月：1/5.346。很明顯的，英國自從放棄金本位以後，爲了實行匯兌傾銷，中國的對英匯率是一年高似一年。美國和日本呢，同樣，也是如上扶梯一般，年年向上昇騰（美國於同時期爲：22.243；21.487；26.109；33.785；35.481；本年最高期五月時爲41.500。日本在同時期內爲：76.081；100.909；113.408；119.090；123.410；本年最高期五月爲143.750）。美國和日本爲什麼要把自己匯率壓得非常低，把我們中國的外匯一年一年抬高起來呢？十分明白的，它們都想要吃我們中國這塊肥肉，它們曉得誰把自己的匯率跌得更兇，誰就能在對華貿易以及其餘許多經濟利益上佔得更大的便宜。我們曾經在第三章說過1933和1934兩年，因爲它們互相把貨幣盡力跌價，英國只能維持原狀，而日本和美國的對華貿易却能大大地增加，就是因爲那時候日美比老大的英國更勇敢一些跌價的緣故。可知任何一個列強都想把自己的匯率壓得更低，雖然匯率的穩定也是它們

所需要的，可是它們看到其餘一個國家比它跌得更兇的時候，它也就得把自己的再往下壓，以求在對自己更有利的地位下面穩定起來。因此在它們，對於穩定這件事是雖然想得而不可得的事情，除非它們某一個國家確實已經確立它的霸權了。這就是所謂資本主義世界的不均衡發展所造成的世界動盪原因的一個例子。然而我們的專家們，却說靠這個新幣制的幾條命令，就能把中國的外匯壓低，而且穩定起來。這是什麼意思呢？

。博士專家們很喜歡什麼倣倣歐美的通貨管理等等話頭，就讓我們來看看歐美是用怎樣的手段來壓低外匯吧！熟讀經濟史籍的博士們，大概總不會不曉得英美爲了壓低自己的外匯，而且想使它穩定起來，它們確是化了很大代價的。譬如說，美國有二十萬萬元作爲匯兌的平準基金，英國則有三億七千五百萬鎊。然而英國到一九三四年時候，據一部份人的估計，三億七千五百萬鎊簡直已經虧蝕淨盡了。再回頭看看我們中國。大家知道中國去年曾經有過一個外匯平市委員會，有過一點很少的匯兌平準基金，這點基金有什麼用處，是大家明白的了。那末我們來把它增加一點吧，譬如說，上海諸華商銀行的庫存額因爲掉換法幣，完全集中在中、中、交三行的銀庫裏面來，中、中、交就可以此來無限制買賣外匯

。截至十月底是 293,529,000 元。比比看，不夠！說「無限制」是更難乎爲情！再假定外商銀行的 40,884,000 元（實際上到現在爲止，只有英系銀行的 13,958,000 元是口頭答應的）都無條件地移交過來了吧，一共是 334,413,000 元，也不夠；離開「無限制」還很遠！再進一步把上海以外各大城市的存銀都集中起來吧，據說廣東全省有六七千萬，漢口有二千萬，杭州有四百八十餘萬，濟南有七百萬，平津有六千萬，一共還不到二萬萬。怎麼辦呢？到民間去把所有的現銀都收集起來吧，不錯的，據估計大概可以有二十萬萬元。這就有點像樣了。但是這許多我們都是在承認了不可承認的前提條件之下說的。要造成這個「像樣」是比登天還要難。外商銀行怎麼能強迫它們移交過來呢？因爲它們並不個個像英系銀行一樣的口頭上答應的。各大城市也已各自各的成立準備保管分庫，要想去動用它們半文，恐怕也不可能，尤其是平津和廣東。民間的窖藏也無法叫他們來掉換法幣，尤其是邊遠省份。因此集中二十萬萬元的平準基金，簡直是等於夢想，那末用什麼方法來把外匯穩定呢？這簡直完全是一句空話！

也許可以說外匯的穩定是已成的事實吧，譬如說，改制後的一月來，自財部規定匯率以後，並沒有什麼變動就是。那末我們就來看看目前穩定的是怎麼一回事。第一，我們說

這個暫時的穩定是在外資的幫助之下，才有可能的。無論是日本方面的造謠，或者倫敦方面的風傳也好，要說二千萬鎊借款是完全無因的，誰也不會相信這件事。賈德幹和英系銀行的出力幫助，是開天闢地的！沙遜和羅斯的口氣是何等的自信！因為他們背後都站着倫敦的如諾爾曼先生之流在鼓勵着呵！第二，請再回憶一下本節開頭所抄的幾個數字，目前「穩定」的是：英匯1/2.5；美匯29元零；日匯103—4元。與過去幾年比較起來，對英，美只比去年低了一點，對日本則比前年也低一些。在這樣子的程度下面穩定起來，英美自然是歡迎的。日本則就要咆哮得跳起來了。假使有一天我們再把它壓低一些試試看，恐怕英，美隨時隨刻都可以輕輕的把手一抬，「穩定」的水泡就會向空中飄散得無影無踪。

外匯怎樣穩定起來呢？靠幾條法令顯然是沒有用處，靠自己的存銀也不可能。因為即使所有全國的白銀都集中起來，假使不把貿易加以統制的話，外貨是大批的運到中國來了，巨額的入超，不利的國際收支，就會把中國所有的白銀化費得乾乾淨淨。實行貿易統制吧，別人的關稅壁壘高得如天一般，中國的關稅籬笆殘破的連一點微風也抵擋不住。就是這點殘破的籬笆也隨時隨刻都可被帝國主義國家撤去的。而且，中國歷年水旱災荒，農業生產力已破敗得不像人樣。要

想增加農產品輸出來彌補入超，也是夢想，除非農民大衆把自己的口糧都完全不要。中國歷年出口品比較有得增加的都是帝國主義用以製造殺人工具的軍需工業的原料，例如桐油，棉花，鐵砂等。任何人都知道，中國的棉花祇有供給外商紗廠紡紗和運到國外去當軍需品的原料之用，而民族紡織工業却天天在喊着花貴紗賤的冤聲。中國的蠶絲業也因長期恐慌的結果，農民大批的都把桑樹砍去了，而上海的絲廠却正窒息在繭的來源斷絕之中。用什麼來統制貿易，用什麼來獎勵輸出呢？這都不是空口說說所能濟事的問題。

在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各種基本工業以前，就算貿易有方法統制。若干必需品的輸入仍舊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物價却高漲了，這只徒然增加了大衆的負擔。這是對外說。在國內，物價高漲的結果，大部份的利益仍舊只是外資工廠的份兒。自然，在民族工業與帝國主義在華工業可以不分的人們，他們的目的，只在口口聲聲的「招致外資」，能夠裝飾成一個殖民地化的工業繁榮也是求之不得的願望，然而最終的歸結，仍舊還須依賴一般大衆的購買力。在苛捐雜稅，高額地租和苛刻高利壓榨下的農民大衆們，用一雙空手來交換工業品嗎，也許可以這樣說吧：農民的農產物價也抬高了呵！農民用他高價農產物所換得的貨幣來購買好了。那末請吧，

地主有滿倉的租穀，因此可以換得很多的法幣，請他推銷一點工業品是不消說的。富農也有較多的剩餘農產物，推銷一點工業品也是不會拒絕的。然而中農，貧農和雇農呢？他們沒有剩餘的農產物可以出賣，他們大部都還須購進農產物來作食糧，農產物價的抬高和工業品一樣，並沒有解救他們什麼，反只增重了他們的負擔；請到農村裏去推銷工業品吧，百分之九十的農村大眾都拒絕你們！

「經濟復興」的勇士們可以回到城市裏面來，這裏有許多工人，店員，以及其餘許多靠薪工過活的人們，『爲了「經濟復興」，請推銷一點貨物吧，城市裏的大眾們』！大眾搖着頭，數着手中的「法幣」：『不能！我們的薪工還是仍舊照從前一樣，可是這種法幣現在不大值錢了。同樣一塊錢鈔票，現在只能換很少的銅板，買很少的東西，我已經把應該消費的必需品都減半了。』「經濟復興」顯然處處都是碰着購買力薄弱的釘子。

問題又似乎轉到購買力上面來了。增工資，減地租，……等待着自己的「經濟復興」的主人們是決不會答應的。何況目前又沒有馬上真的復興起來，博士和專家們大都是假裝着不知道不說，一部份人知道了也只輕描淡寫的一筆：「購買力也隨着向上。」用什麼方法，用怎樣的程度來使牠向上，

他們都不管，他們只要「復興」。於是他們又想到如何使資金圓滑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前途，他們也是完全樂觀的。因為外資可以招致進來，逃亡的資本也可以投回到國內來了，而且，當局正在籌備組織地產抵押銀行，修正不動產抵押法，據說只要一等立法院審議通過，地產抵押銀行就可以開設起來，因此資金也就可以流通圓滑了。現在且不說審議通過要到什麼時候可以完成。銀行家們和地產主以及投機商人們，自然希望能早一天實行就好一天。照地產市價有十分之八可以抵押，再用這個來做高利的放款，地產主人回憶得微笑起來了。把凍結着的游資動用起來，可以得八九厘或一分到一分以上的押款利息，銀行家們自然也欣喜若狂。投機商人們又可獲得了一個活動的地域，瘋狂一般的投機熱又可旺盛起來，於是虛偽繁榮的面目又可暫時粉飾一下。「經濟復興」呵！

可是，已往的經驗告訴我們，地產業的過度活動，就是表示大部份的資金向非生產的事業上面發展，農工商業反不會得到什麼潤澤。接着必然是資金仍歸凍結，虛偽繁榮的面幕又須揭開了。已往的事實是這樣過來的，將來的發展不是重演一遭，便是以更大規模的形式開闢新的衰落紀錄。「經濟復興」在那裏呢？

只有一件倒是可能的，就是銀行資本的集中。由這次新幣制的結果，中、中、交三行可以無限制發行鈔票（法幣），開設地產抵押銀行，辦理再貼現；於是所有的資本也都可以流入到財部的外庫裏面來，這大概就是「經濟復興」吧！那末，這個復興並不自今日起，今年三月間中、中、交三行事實上的合併，增加官股等，早已在開始着了。

第三節 救濟財政危機和摩登化的貨幣割據

這次貨幣制度的改革，除掉標榜着「經濟復興」以外，第二個目的是救濟財政危機，也就是說在新幣制實行以後，「十八個月內可以平衡預算」了。

中國財政赤字並不自今日始，北京政府時代不用說早已具備，隨着南京政府的產生更形擴大，不過到目下是更形嚴重罷了。因為巨額債務和軍事費用的支出，中央政府無日不在跳火坑的情況之中。過去的所謂「開源節流」，因為軍債費用年年擴大，「節流」成爲一句空話。「開源」呢，則大約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在民國二十二年以前，宋子文氏掌理財政時代，主要的開源辦法是發行公債。總計自民十六南京政府成立到宋氏辭職的時候，中央計發行公債有十四萬萬之多。在一個經濟落後，工業生產尙屬十分幼雅的中國，這個數額

不可謂不大。鑒於完全依賴公債政策的破產，宋氏遂不得不掛冠而去。孔財長上台以後，財政方針，由借債政策轉變到增稅政策。在這轉換的過程中，去年元旦的鹽稅衡制改革，統稅如捲烟火柴等的增稅改制，都可算是幾件巨大的公案。因為增稅的成效，竟能補償東北稅源的巨大喪失，二十三年的財政難關雖在超過民二十年的數額之上，也勉強強強的渡過去了。民國二十四年一開始，財政難關仍舊隨着新年以俱來。然而舊有的稅源增的已經增了，改的也已經改了，增稅的繼續是開闢新稅源。交易稅，所得稅，遺產稅也就列入財政預算的圖表之中。可是這許多新計劃顯然遇到阻難了。交易稅因為交易所經紀人（經紀人和政府要人多有密切關係），的反對只得緩徵；遺產稅也因為外人可以代中國出面管理財產的現況之下，遺產大本營的上海就不可能推行有效；所得稅呢，在外商產業不受中國法令節制的現況之下，只施行於華商產業，也未免苦樂不均。放棄了主要的來源——產業利潤，而只向薪工階級徵取，所得稅究竟能有多大出息，也是想得到的。新鹽法的公佈已經數年，實行却不知何日。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勢力的障礙，就是在財政上的幾個改良主義的措施上面，也很明顯的表現出來了。

可是財政危機的深化，迫得財政當局不得不另外去尋開

源的辦法。自然，增稅之外的借債，也只好仍舊兼行並施起來。三月間的一萬萬金融公債，六月間的一萬萬關稅公債，都是企圖來解救這個難關的。然而公債政策如何使前財長場台的教訓，現財政當局是深刻地記憶着的。可是另一方面，睦鄰政策之下的「安內」費用，逼着財政當局連喘氣都沒有空閒的又須向前開步了。

發行公債之路不通，增稅政策也已到了絕境的當兒，恰巧「大旱時候的雲霓」羅斯爵士沛然光降，於是「十八個月之內預算平衡」的生機也就湧上心頭。其實，要十八個月之內才能平衡的說法是太謙虛了一點的，而且說是等到羅斯來華了才想着這個妙計，也有點太埋沒天才的說法。早在今年三月間，中、中、交三行增股改組，也已可算是這個改革過程的開始，不過到十一月四日，羅斯爵士更注射一點施行的勇氣罷了。

怎麼樣來解決平衡預算問題呢？在野的博士們也有許多樸實的解釋。據說，第一，幣制改革以後，因為法幣對海關金單位比價跌落，關金換算成法幣以後，收入可以增加了。第二，因為外匯穩定，貿易向上，關稅收入也可增加了。第三，也因法幣跌價關係，一切從價之租稅可以加多。第四，同樣的原因，國營事業的收入也可以增加。第五，工商業復

原，一切稅收更可以大批的增收了。讓博士們去十七八點的表面上的「增加」吧！因為法幣跌價的關係，支出亦隨着會表面上「增加」的一個事實，就會把他們的十七八點都化爲烏有的。至於工商業復原呢，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並不是「十八個月以內」的事情呀！

只有一位專家是說得中肯的，他說：『……以實行新貨幣政策之本月四日言，世界銀市，每標準銀一盎斯，合值英幣 29 $\frac{5}{16}$ 辨士。則照此行市，吾國國幣一元，在世界銀市即可值 23 $\frac{1}{16}$ 辨士。而查當日中央銀行所開出的對英匯價，每國幣一元僅爲 14.5 辨士，相差較低達 9 $\frac{7}{16}$ 。換言之，即國幣實際價值，在國內被壓低達 65%。故反言之，國幣一元，照當日銀市計算，應可實合面值 1.56 元。照目下情形，華商銀行存銀約爲二萬八千萬元，外商銀行存銀約爲五千萬元。上海全部銀行，存銀共爲三萬三千萬元。而此三萬三千萬元面值之國幣，其實際價值，照當日銀市，實可合高 65%，而爲五萬四千萬元。同時再一查最近各行紙幣發行數量，總額不過在四萬三千萬元左右。以實值五萬四千萬元之現銀，爲四萬三千萬元發行之準備，其準備成數，即爲百分之一百十二強 (112.6%)，換言之，即目下各行所有發行，每紙幣一元實有實值 1.26 元之現銀爲之準備。故在現狀下，即再加一倍紙

幣，至發行總額達九萬萬元時，尙可有六成現銀準備……有此項實值遠超面值現銀之收歸國有，可以由適宜（注意「適宜」！）之運用，而謀財政之漸入平衡。……」（新聞報十一月八日）博士倒底不如專家，原來是這樣「平衡」的呵！紙幣愈多發，只要把「開出的對英匯價」輕輕的一改，準備也就愈加多起來了。博士們，懂嗎？

再說一說統一幣制吧！

我們在第一章第二節裏曾經說到中國幣制的特性：第一，是半殖民地性的，因為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存在，中國在貨幣上表現出來已經被分割得支離破碎了。滿洲，兩廣，雲南，西藏，早已不是中國貨幣獨自流通的處所，反之倒成爲日，英，法，三國貨幣的馳騁之場。只要他們把貨幣的咽喉輕輕一捏，這許多區域的整個金融就可紛亂得難以透氣。第二，地方割據性也是儼然的存在。或是幾省連成一個區域，或是各省各自造成一個王國，它們都各自有各自的金融機關，各自有各自的貨幣。最近，因為反映帝國主義勢力在華爭奪的強化，它們更形成割據布洛克的形式，創造種種於己有利的貨幣理論。中國大小城市內的商業資本家們，也利用中國市場的地域性而發行種種「但書紙條」的白票，尤其在輔幣方面，更是他們活動的場所。這一種形勢，對於企圖

中央政權的強化自然是莫大的障礙。可是它們的勢力，因為也有帝國主義作後盾，中央與地方的鬥爭，也就表現帝國主義勢力的傾軋。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爭奪愈利害，中國的地方貨幣集團的割據形勢也就愈加表面化起來。

這次幣制改革後的情形是怎樣呢？南京財部的命令，把所有全國的現銀都集中起來，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以中、中、交三行的紙幣爲法幣，南京的願望，想一口氣把各省的現銀，都運到上海自己的外庫——中、中、交三行裏來，把地方當局並不歡迎的法幣掉換出去。想藉操縱經濟命脈的手段，減弱各地方當局的勢力使其俯首就範，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可是地方當局頑強的「抵抗」了。廣東是最先「將計就計」的於七日頒佈同樣的命令了，在這道命令之下把「國有」很聰明地解釋爲「省有」，以省銀行的鈔票代替中、中、交行的鈔票爲法幣，省票發電到美國去趕印來不及，則以舊有鈔票加蓋「法幣」二字的印戳，無阻礙的通行。廣西當局呢，本來要想到南京來聽聽五全大會的條件的，一聽到改革幣制了，馬上拉回馬頭向南甯馳奔，頒佈下一道以廣西省鈔爲法幣，運銀出境處死刑的嚴令！接着，華北，山東，也「奉命」不允南運，而且更熱辣辣的給一個五省，三省的自治國來給南京看看。再接着，甚至湖南，浙江也要學樣了

，他們都請求不要把白銀運出省界。結果，南京是屈服下來，事實上修改了一下他自己口頭上發佈的明令。對於兩廣省鈔當法幣的事實也加以默認，對於各地不允白銀外運則准設發行準備管委分會。起先是平津漢口各一處，繼則加廣東一處，再則連濟青共四處，湖南等地說不定也會「效尤」。可是廣東並不以此為滿足，它却處處很聰明的先發制人。準備管委分會在未有明令以前即着手組織，一得到南京有允准設立分會的消息，馬上發電給南京說，分會正在組織，分會的人選也已決定，請求南京加委。於是南京派去的分會主席也只得半途而不聞行踪。

此外如綏遠以及西北等省，據說因為是邊遠省份，「法幣的推行並未普遍，民間用現的習慣尚深」，尤其綏遠，因為與新疆等省交易須完全用銀，照原來習慣則違抗法令，守法則阻礙商業，法幣的推行，恐怕不僅是幾年以內的事情。

隨着各地推行法幣所發生的一個嚴重結果是：市面上流通的輔幣大大地缺乏了。照理說來，法幣的推行並沒有禁止輔幣如銀角銅板等的使用，輔幣仍應照原有的情況在流通着。但輔幣的缺乏是鐵一般的事實，只要不是染了博士和專家的糊塗氣，這個事實是很容易理解的。「法幣爲了增加準備」起見，是大大地不如從前一樣值錢了。銀元已經被漢奸浪

人用一元一角以上的法幣價格收買，成船成袋的運到海外去，或者窖藏起來了。銀元收買完結，銀角銅板也就成爲收買，偷運，窖藏，囤積的對象。「爲了增加準備」，法幣將繼續跌價，這不僅是專家都週知的普通常識。因此，自然而然的輔幣缺乏也就成爲問題了。可是這個缺乏却使兩種人們受着各自不同的影響：一種呢，是有了錢而且也並不缺乏輔幣的人們，但是他們裝出似乎很關心這個問題的樣兒來。爲了救濟這個缺乏，他們就發行一批如銅元券之類（河北最近正在發行三十萬元的銅元券）的東西，藉此，他們儼然也是一個發行「小法幣」的機關，大法幣所給予發行者的利益自然他們也都同樣具備了的。另一種人們，則是既無本位法幣又無輔幣的貧苦大眾。他們不能很闊綽的把幾日勞苦所得的一元二元法幣一次用完，輔幣在他們倒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流通手段。把法幣來兌換銀角銅板要吃虧一大筆是不必說，把大法幣來兌換「小法幣」也是同樣要受很大的虧損。貨幣，目前對於他們，簡直覺得是一個累贅了！

第四節 新幣制的前途

這個新幣制的前途究竟怎樣，這恐怕是大家都願意知道的事實吧。我們在這裏，還是如第三章的結尾所指出的，前

途只有兩條，不過更具體一點吧了：

第一條，就是照目下的方向繼續發展。假定說，英國的借款二千萬鎊或者更多一點已經成功了，依着英鎊的靠山，外匯的暫時穩定是可能的，只要不損及英鎊的以及過份損及美元日圓的利益。賴着不兌換紙幣的繼續增發，財政危機的暫時渡過也是可能的。不過要由此得出工商業復興的結論來，未免太樂觀一點，最多再來一個畸形的地產業投機的繁榮。可是事實所昭示給我們的，連這一點恐怕也不十分可靠。英國的借款問題，東鄰日本不是震天價響的除口頭之外還用炮聲在抗議嗎？解救財政危機的紙幣無限制增發，結果要影響到外匯的更趨壓低，連英國也恐怕不會答應吧！那時候，英國當然是不會直接來干涉濫發紙幣的；它，早已在新幣制改革的同時，把港幣跌價，準備在某一個時會，與中國的法幣同價，（就是所謂與滬匯平衡）。等到中國的法幣再因膨脹而跌價的話，那末，港幣就可以取而代之了。這樣，中國的貨幣也就完完全全的不僅是投入英鎊集團，而且是被英鎊消滅了。不過，在這個形勢造成以前，恐怕要先爆發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領土上的炮聲了吧！

第二條，是中國爭取獨立貨幣存在的道路。這一條道路走起來自然是很困苦艱難的！爲要不作帝國主義的犧牲起見

，困苦艱難的責任，中國的國民已經是不能躲避了。前途的展望是如第三章結尾所說，仍舊還是中國民族的真正獨立，工農業生產的真正大規模發展……大衆購買力的真正擴大等等。目前具體的辦法，則如鄭洪年先生所說：『準備管理委員會的組織，只由金融界領袖參加，恐怕他們只顧本身的利益，所以同時應該由其他各界領袖參加，如自由職業的律師，會計師，經濟專家，教育家等領袖……』我們以為除鄭先生所說的以外，這個準備管理的組織，還應該添加一般大衆的代表。然而這些似乎都是枝葉小節，真正獨立健全的貨幣制度，一定要等中國民族真正解放之後，才有可能出現的。

